

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 ——以屏東平原為起點

林 正 慧

摘 要

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閩粵分類械鬥是常被論述或研究的課題。以方言群觀察族群關係，在清代臺灣史的相關研究上，似較不為學者所重視。於是，長久以來，客家方言群移民常被納入粵籍中處理，將粵等同於客家，閩等同於福佬，似乎是不辯自明的概念；以往學者在處理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時，亦多以橫向的省界為分類標準。然而，所謂的「閩、粵」與「福佬、客家」其實分屬省籍與語系兩個不同的分類範疇，彼此界線並不相符，而且存在複雜的交集與合集關係。因此，在瞭解廣東省與福建省民系或語系的分布後，其實應將縱向的語群分界納入考量，藉由省籍與語言界線所穿插出來的四個區塊，可以更清楚地瞭解清代來臺漢移民間的結合情形。本文藉由康熙 60（1721）年發生在屏東平原的朱一貴事件及道光 26（1846）年分類械鬥中人群分合的初步釐清，瞭解清代屏東平原漢人間的分類衝突，其人我界定標準並非省籍等行政疆界，即當時屏東平原漢人的族群關係，與其說是依分籍對立，毋寧說是依方言分類，因為只有從這個觀點切入，方能瞭解為何當時閩屬汀州移民「附粵不附閩」，以及粵屬潮、惠二府移民多與漳泉交好的現象。本文雖強調方言群認同在清代屏東平原漢人族群關係的作用，卻並非認為方言群的認同作用必然大於祖籍或鄉黨意識。在不同區域內，移民人數與其文化經濟力量的強弱會牽引出不同的族群關係。提出方言群的思考方向，只是希望在以往祖籍的單線分類之外，提供思考清代漢人族群關係時另一個可供參考的面向。

關鍵詞：閩人、粵人、福佬、客家、屏東平原

Fujianese-Guangdongese or Holo-Hakka?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aiwan's Han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 Dynasty —Beginning on the Plains of Pingdong

Cheng-hui Lin*

Abstract

The discord in classification of Taiwan's Fujianese-Guangdongese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s a commonly discussed and researched issue. Thus far,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historians of Qing Taiwan has not attached any special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rvations of ethnic group dialects. Therefore, for many years, immigrants with a Hakka dialect were often grouped with those from Guangdong, causing the seemingly self-evident concept that Guangdongese were Hakka, and similarly that Fujianese were Holo. Previously, when scholars had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s Han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 classification was commonly made through horizontal provincial boundaries. However, so called 'Fujianese-Guangdongese' and 'Holo-Hakka' in actuality enjoin classifications of province and language family. Such a division is by no means consistent, as complicated mixed and intersecting relationship exist.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ethnic and language groups are classifie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s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vertical language group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intertwining provincial and lingual borders in four areas, it is possible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uniting Han immigrants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initial classification disparity between union and division of ethnic groups involved in the Rebellion of Zhu Yigui occurring on the plains of Pingdong in 1721 and 1846,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classification conflict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between the Chinese from the Pingdong plains. This definition is not one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namely the relationship of Pingdong Han ethnic groups: what is said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oppositions in divisions of nationality, but rather in accordance with dialectical classifications. Only this perspective enables understanding of why Fujianese immigrating from Dingzhou ‘adhered to Guangdongese not Fujianese’ and why Guangdongese immigrating Chaozhou and Huizhou were on intimate terms with Fujianese immigrating from Zhangzhou and Quanzhou during this time. This text, although emphasizing identification of Han ethnic groups of Pingdong plains area in the Qing by dialect, does not argue that dialect identification superceded that of an ancestral home (native) or village consciousness. Within different regions, immigrant numbers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ir cultural-economic force drew forth varying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s. While raising the concept of dialect groups, I hope to provide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observation of and reflec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

Key words: Fujianese, Guangdongese, Holo, Hakka, the plains of Pingdong

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 —以屏東平原為起點*

林 正 慧**

壹、前言

以往在處理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閩粵分類械鬥是常被論述或研究的課題；而當論述到戰後本省人的族群關係時，被指涉的對象却是以語群區分的福佬與客家。¹從以往省籍的概念到如今語群的概念，其中的落差何以致之？或者由於清代臺灣屬福建省轄，廣東移民隔省流寓的身分倍受注意，又或者基於治理的方便，在清代相關資料中，除部分事例明顯注意到各籍移民內部的歧異外，大部分均以閩、粵稱之。²日本領臺後，官方以及大部分的學術著作，對臺民的分類是簡單的閩粵二分法，有時候即視之為福客之分，後來研究者對省籍的閩粵與語群的福客間的混淆可能自此開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4 年 3 月 16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 年 6 月 11 日。

** 國史館助修

¹ 就清代臺灣的漢移民而言，所謂的福佬語系，係指來自閩南泉州、漳州，和粵東潮州、惠州沿海各府，以操閩南方言為主要文化特徵的民系，客家語系則是來自韓江上游汀江和梅江流域的閩西汀州府和粵東嘉應州，及潮、惠二府內陸靠山地區，如大埔、豐順等山區各地，以客家方言為主要文化特徵的民系。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頁 34-35。本文為更清楚地論述省籍與語系的概念，故將「閩南話」代以約定俗成的名詞「福佬話」。

² 汪毅夫則認為，由於臺灣移民社會「鄉關分類」的意識（即按祖籍地分類而聚的觀念），粵東移民裡的客家人和閩南人被統稱為粵人，粵人的聚居地被稱為客庄。於是，臺灣的客家人和閩南人的關係，往往表現為粵人和閩人的關係。參見汪毅夫：〈再談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 9 月），頁 53。

始。³由於相關史料的侷限性，導致許多研究在處理清代漢人族群關係時，亦常以「閩粵」關係切入，客家移民常被納於粵籍中處理，於是，將粵等同於客家，閩等同於福佬，似乎是不辯自明的概念。然而，所謂的「閩、粵」與「福佬、客家」其實分屬省籍與語系兩個不同的分類範疇，彼此界線並不相符，而且存在複雜的交集與合集關係。因此若仍將閩籍視為福佬、粵籍視為客家，將省籍等同於語群，不僅使得「客」與「粵」的界定顯得模糊曖昧，亦因此忽略了其中更複雜的跨省籍的語群結合或衝突。

以方言群觀察族群關係，在清代臺灣史的相關研究上，似較不為學者所重視，如陳其南表示方言群認同的重要性比不上含義更廣泛的「鄉黨觀念」，方言認同只不過是鄉黨觀念的一個特化現象，最根本的問題乃是祖籍觀念，方言的不同正好加強此種祖籍意識；即使方言相同，其社群的分類意識仍然存在，其尖銳性甚至不亞於方言群的衝突。⁴然而，情形是否果真如此？進一步來看，所謂的祖籍係指移民原來移出之處，祖籍的認同範圍可大至省，或以州府、縣等行政區劃為範圍，以往在討論到清代漢人移民的分類械鬥時，即普遍以省籍的閩粵械鬥解釋，或以府級的漳泉分類看待，完全只限於以行政界線來處理清代漢人族群關係。祖籍觀念若擴至省的層級，則無法觀照到許多可能存在的人群內部的分歧，如當時來臺漢人的原居地，無論是福建省或廣東省境內，均存在著紛歧的語言與地域文化，即「粵非全客、閩非全福」；再者，若祖籍觀念縮至府州或縣的層級，則各人群的合縱連橫中，除了省籍的行政區界線的認同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認同依據是有重要作用而可能被忽略的，如方言的作用。

在理論的層次上，方言群可以被界定使用相近的語言，及有著相近的風俗習慣或信仰系統的一群人。基本上，方言群並不是一個具體或正式的

³ 邱彥貴：〈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東方宗教研究》，新3期（1993年10月），頁129。

⁴ 陳其南：〈社會分類意識與土著化〉，《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91年），頁122-123。

地域組織，只能說是一種特殊的群體意識，當此意識表現於群體活動時，它便成為一個社群的分類法則。⁵由於每個方言區皆有個別的地理區域、不同的維生方式，及與之相應的聚落形態、物質文化、風俗習慣等，也就是說，不同的方言區會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因此，擁有不同文化內容的民系也就相應而生。所以，在中國大陸漢族民系的相關研究中，多肯定方言是民系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區分不同文化區域、不同族群的根本標誌，因此民系的分布區往往是方言群的範圍。⁶

因此，當漢移民飄洋過海到新居地，必會帶去自己原有的方言及地域文化，當人群達到一定數量，其方言與文化便會被移植過去，成為彼此認同的依據。⁷由於語言本身具有一定的保守心理與認同作用，人們會透過語言形式的類化取得群體的歸屬感，因此，是否說著同樣的語言或方言容易變成識別彼此、區分你我的指標。⁸綜上而論，在考慮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時，實不應僅囿於祖籍或鄉黨觀念，更應重視方言在人群關係中的作用。

其實，以方言群做為人群的分類原則，在臺灣以外的地區早已累積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如美國人類學者孔邁榮（Myron Cohen）研究廣東及廣西客家與本地兩個不同祖籍人群間的關係時，亦發現方言（dialect）的差異是引起廣、客兩社群衝突的根源，雖然無法斷定廣、客兩社群在兩廣之外是否呈現相同的社會互動形態，但原則上肯定方言群認同的存在，方言如血緣、業緣，是中國社會結構中另一種群體認同（group affiliation）

⁵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頁15。

⁶ 如陳支平所著：《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或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其民系的分界其實等同於方言的分界。

⁷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年），頁148。

⁸ 林嘉書：〈從文化角度談談客家方言研究〉，見氏著：《土樓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01；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12月），頁174。

的方法。⁹

人類學者謝劍教授所著《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一書中，亦提及由於屬於惠州的海豐和陸豐兩個非純客住縣，其地與潮州相鄰，且部分領域係析自明代潮州之惠來縣，因此居民多自稱福佬，在文化和語言上接近閩南，而迥異於同屬廣東省轄境內的客家人。因此，惠州境內非客籍人士的組織社團策略之一是尋求相同方言群的集合。於是，可見到惠州境內的福佬和閩南及潮州籍人士組成冠以「福潮惠」之類名稱的志願團體，表面似基於地域原則，實際上則是基於方言原則。¹⁰

另一方面，海外華人的相關研究中，更是普遍將方言群做為族群認同的主要標準。¹¹此研究取向與清代臺灣漢人族群的相關研究有相當差異。誠如麥留芳所言，方言群認同在海外比較突出的原因，在於海外的人際關係不若在中國內地，有自然界限據以區隔不同語系的人群。在原鄉的時候，由於社群間缺乏經常的社會接觸而較少構成認同問題；到了海外，移民必須做最表面化的社會接觸，語言上的差異便很自然地被各社群體驗出來，終必導出內外群觀念，此即方言群認同的基礎。¹²麥留芳對星馬一帶華人分類情況的研究指出，由於星馬一帶從事勞務密集的種植與採礦工作，勞力的需求因素會促使一個祖籍群擴大地域界限以至包含其他祖籍群，其地域界限的擴大止於方言群認同，因此認為方言群的認同比祖籍群認同更符合星馬華人的社會經驗。¹³

李亦園在馬來亞麻坡的研究亦指出，不論是整個馬來亞或是麻坡的華人，均主要來自廣東、福建二省，依使用方言之不同，可分為福建人（閩

⁹ Myron L. Cohen,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al-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Rethnohistory* 15:3 (1968), p. 241.

¹⁰ 謝劍：《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13。

¹¹ 何翠萍、蔣斌：〈導論〉，《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23。

¹²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頁192-197。

¹³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頁183。

南)、廣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福清人、興化人等幫別。整體來看，福建人占全馬華人最多數，其次為廣府及客家，再次為潮州。¹⁴各方言群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各自不同的看法與想法，對我群有很強的自尊心，看不起其他方言群。因此，在麻坡華人社會中，無論是宗族或同宗會，對人群的規範作用相當有限，甚至麻坡華人社會的婚姻關係也頗受方言群的限制，仍相當嚴謹地保持方言群內婚的風俗。¹⁵從蘇慶華的〈北馬潮人早期之經濟活動初探〉中亦可瞭解，十八世紀末期，檳榔嶼的華人社會結構係以幫群為主，當時潮籍甘蔗種植業先驅人物在當地構成了「潮州幫」，使其得以在檳州甚至北馬一帶的華人領導層中，發揮所代表的方言群之權勢與影響力。¹⁶

根據 J. J. M. De Groot (高延) 對《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所做的相關研究，可知婆羅洲的華人主要來自廣東省粵東沿海地帶的福佬人、廣東省山區地帶的客家人，以及來自福建省的閩南人。來到婆羅洲島的福佬人與客家人，因彼此方言及風俗不同，常發生激烈械鬥。當地的閩南人則顯得熱愛和平安定，少參與和其他移民的鬥爭。¹⁷周丹尼所著《砂勞越鄉鎮華人先驅》一書中，亦指出砂勞越華人主要來自福建、廣東二省，當地華人間會因方言不同而分幫分派，其中福州人、客家人是砂勞越境內兩個最大的方言群，其次依序是福建人（漳、泉）、詔安人、潮州人及廣東人。因方言不同而互相對立衝突是當地華人社會的特徵，不同方言群間常會出現不同組合的合作或對立模式，如當地潮州人與福建人之間競爭激烈，有福建

¹⁴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6月），頁56；安煥然：〈論潮人在馬來西亞柔佛坡的開拓〉，《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8卷2期（2002年），頁80-91。

¹⁵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頁124、213-214。

¹⁶ 蘇慶華：〈北馬潮人早期之經濟活動初探〉，《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8卷2期（2002年），頁93-100。

¹⁷ J. J. M. De Groot (高延) 著，袁冰凌譯：《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頁36、45-47。

人與詔安人結盟對抗潮州人之事例。¹⁸此外，越南華僑團體的分類亦是根據祖籍與方言，可分為廣肇幫、潮州幫、福建幫、海南幫及客家幫。每幫設一幫長，各設有公所，各置地產、學校、醫院及義山。¹⁹

綜上可知，東南亞一帶海外華人移民多來自中國東南的福建與廣東二省，其族群關係，有一大致的分類軌跡。首先，客家方言群常呈跨省的連結。如有學者指出，福建省出洋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永定縣，移居海外的永定人都和廣東梅州籍的華僑組成社團，屬於客家幫，多在印尼、馬來西亞開發錫礦、做中藥生意。²⁰其次，客家方言群以外的廣東、福建二省各幫別，係依據行政疆界或地理界線區再區分次團體，其表面上雖然呈現的是地域原則，但實際上仍是符合方言群界線（參考圖 1）。

¹⁸ 周丹尼著，黃順柳譯：《砂勞越鄉鎮華人先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1990），頁 16-18、119。

¹⁹ 周昭京：〈會館的起源〉，《潮州會館史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78。

²⁰ 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99。

圖 1：海外華人人羣分類原則

廣東	廣府（粵方言）
	海南（閩南語海南方言）
	潮州（閩南語潮汕方言）
客家	（跨閩粵二省）（客家話）
福建	漳泉（閩南語）
	福州（閩東語）
	興化（莆仙話）

資料來源：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6月），頁56；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頁183；蘇慶華：〈北馬潮人早期之經濟活動初探〉，《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8卷2期（2002年），頁93-100；周昭京：〈會館的起源〉，《潮州會館史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78；根津清：《客家－最強的華僑集團》（臺北：絲路出版社，1995年7月），頁111-112。

方言群認同對海外華人的族群關係研究而言，是行之有年的論述概念，也是如今臺灣漢人族群關係的分類依據。但用之於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無疑是較為不同的切入點。近年來，對於祖籍或語系作為清代漢人分類原則的論述，已逐漸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說法出現，開始重視方言群的作用。如尹章義在〈臺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比較研究法－以臺北及高屏地區為例〉一文中指出，籍貫未必可以確定一個人的語群屬性。²¹簡炯仁亦認為漢人原籍對屏東平原族群關係的影響，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基本上，原鄉祖籍在臺灣南部的族群互動關係上似乎沒有那麼被重視，「語言」

²¹ 尹章義：〈臺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比較研究法－以臺北及高屏地區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6月），頁9。

確是非常重要的。²²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學者的論述幾乎都是因為聚焦於屏東平原的結果。清代屏東平原漢人的族群關係之所以可嘗試用方言群認同的角度來探討，除了文獻所能透露的資訊較為豐富外，另一個原因則是，當地客家族群不僅有相當人數，且有六堆鄉團組織的運作，使得清代屏東平原的族群結構與臺灣其他區域頗為不同，因此可以作為以方言群認同觀察清代臺灣族群關係的一個起點。

綜上，本文擬自清代屏東平原閩粵兩省移民族群之關係起步，初步釐清當時漢人分別彼此的實情。本文第一部分，將針對福佬與客家兩大方言群在其原鄉的分布進行瞭解，釐清當時閩、粵二省的漢人移民，其方言群屬性為何，藉以作為爾後論述清代屏東平原族群關係的依據。第二部分，除對清代屏東平原人群的結構進行初步瞭解外，進一步藉由朱一貴事件及道光 26 年的分類械鬥，梳理出當時屏東平原人群分類的脈絡。總之，本文希望就有限資料的爬梳及串連，將清代閩粵二籍移民在屏東平原中的分合情形做一約略的釐清，期能經由本文作為一個起始，逐步瞭解方言群在清代臺灣人群分類時所發生之作用，以及當時人群關係的真實情形。

貳、移臺漢人原鄉的方言群分布

在中國，各方言群有共同的生活地域、相同的維生方式與風俗習慣，表之於外最為明顯的，即各自獨特的方言。由於中國地域廣大，漢語方言分歧嚴重，因此，對於漢語方言的分類和分區理論一直是中國大陸方言學界相當關注的範疇。對於漢語的分類，從初始僅粗略地依山川形勢、江河

²² 簡炯仁：〈高屏地區土地開發與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2 期（1999 年 6 月），頁 12。

流域為依據所劃分的十系、²³十二系，²⁴到後來加入語言材料的考量及移民、人文地理等因素所提出的五大系、²⁵八系，²⁶乃至八十年代以來被普遍接受的七大方言之說。

漢語七大方言，係指官話、閩方言、客方言、贛方言、吳方言、湘方言及粵方言。其中，除北方官話外，漢語南方六大方言，吳、湘、贛、粵、閩、客的產生，都是由於歷代北方漢人向南方遷徙，在特定區域內，與特定的土著民族經過一定時間的融合演變的結果。²⁷換言之，大多數的漢語

²³ 最早嘗試將現代漢語加以分類的是章太炎，其以自然地理的條件解釋方言的差異，將方言分為十區。一般多認為章太炎對方言面貌的描寫和解釋並不科學，例如，將廣東視為一種方言，未能反映出廣東省長期以來存在粵閩客三大方言鼎立的實況。參見黃家教、詹伯慧、陳世民：〈有關漢語方言分區的一些問題〉，收於黃家教等編：《漢語方言論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頁5-7；詹伯慧：〈漢語方言的分區及其主要特點〉，收於詹伯慧主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頁45。

²⁴ 黎錦熙曾依江湖流域分布將漢語分為十二系，雖已注意到根據語言材料，有些支系已明顯打破省界，但仍未能擺脫山川地理的框架，尚未能正確反映客觀現實，例如將福建歸為閩海系、廣東歸為粵海系。參見黃家教、詹伯慧、陳世民：〈有關漢語方言分區的一些問題〉，頁5-7；詹伯慧：〈漢語方言的分區及其主要特點〉，頁45。

²⁵ 一九四〇年代，王力在《中國語文講話》中，把漢語方言分為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五大系，下分若干小系，可說已注意到語言特徵，非僅依照地理區劃劃分，如將官話統為一區，完全拋開山川地理、行政區分的界限。因此之後相當長的時期中，中國語言學界習慣暫用五大方言說。但後來逐漸發現五大方言未能概括漢語方言的全貌，如將贛、湘語也納入官話就有待商榷。參見黃家教、詹伯慧、陳世民：〈有關漢語方言分區的一些問題〉，頁5-7；詹伯慧：〈漢語方言的分區及其主要特點〉，頁45。

²⁶ 1934年趙元任將漢語方言分為九區，1937年李方桂分為八區，均已明顯排除山川地理概念的干擾，著重語言事實的異同。1955年10月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丁聲樹、李榮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發表了〈漢語方言調查〉，提出新「八大方言」說，即官話、吳語、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南方言和閩北方言，與李方桂的八區之說稍有差異，如將廣大地區的官話合為北方方言，閩南、閩北分為二區，湘方言自成一區，客、贛分離。此後，乃成為通行之說。參見黃家教、詹伯慧、陳世民：〈有關漢語方言分區的一些問題〉，頁5-7；詹伯慧：〈漢語方言的分區及其主要特點〉，頁45。

²⁷ 黃金文：《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年），頁13；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頁238-242；沈錫倫：〈表現民族文化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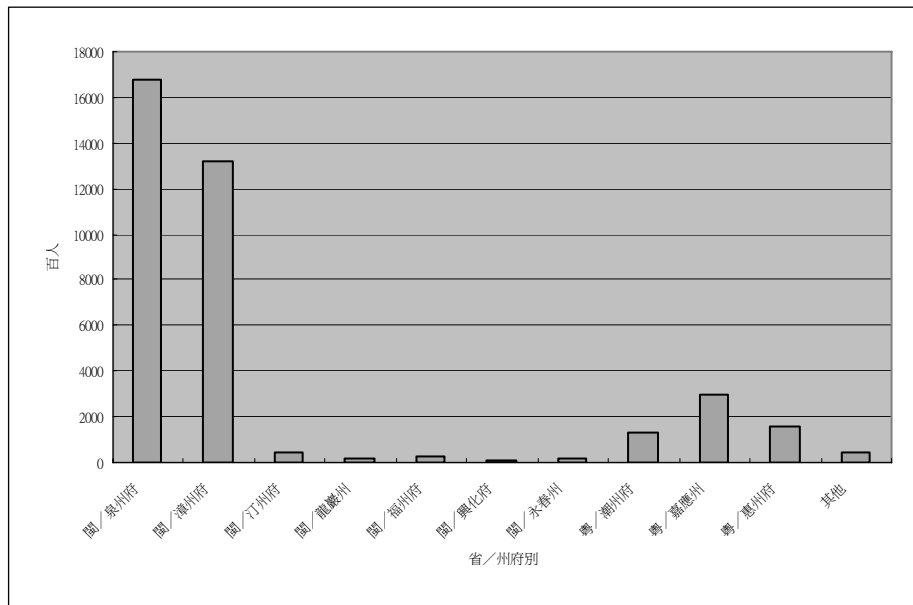
方言是隨著歷次北方漢人的南下，多源流、多層次整合的結果。方言分化和融合的內容不同、過程不同、方式不同，就會造成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差異。²⁸

清代臺灣主要的漢語方言有二種，即閩南語（即福佬話）與客家語。清代移墾臺灣的漢人，與移民海外的華人一樣，主要來自福建與廣東二省。由圖 2 可知，就祖籍分布來看，福建省移民中，主要以漳、泉二府為主，且占全臺漢移民的大多數，另有少數的汀州府移民。廣東省移民中，則以嘉應州、潮州府與惠州府為主。而若就方言屬性來看，來臺漢移民的方言群主要以福佬語系及客家語系為主，相較於東南亞等地華人社會的人群幫別，少了廣府、海南等語系，相較起來單純許多。本節主要依福建省及廣東省的福佬與客家語系分布作一介紹，以瞭解福佬語群和客家語群在漢人移民原鄉的分布狀況與特徵。

形式—文化語言學初探》，收於邵敬敏主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63。

²⁸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7；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311、315。

圖 2：臺灣漢人祖籍別調查（1926）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 年 3 月），頁 4-5。

一、福建省的福佬與客家

福建省的方言分布，除零星分布的贛方言、吳方言及北方方言島外，主要分為閩方言和客家方言兩大系。其中，閩方言又可分成閩東、閩北、閩中、閩南和莆仙五片（參見圖 3）。²⁹福建省各方言片的形成，主要是北

²⁹ 一般認為，閩語系雖可分為五大片，但整體來看，其東西差異十分明顯。其中，閩南、莆仙、閩東三區可稱為閩語東三區，閩北、閩中二區可稱為閩語西二區。兩大區的分界與晉代晉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此現象與歷史交通地理密切相關。即福建的開發主要來自兩個方言，一是由海路遷入大批北方移民，先在海濱建立一系列縣城，再沿河谷向內地推進；一是由陸路從浙江、江西越過仙霞嶺、武夷山進入福建，在閩江支流上游各流域設縣，組成建安郡。兩郡之間長期沒有大規模交流接觸，交界地帶至唐代才逐步填滿。就語言特徵來看，福建省的方言分布，東部沿海地帶是閩語的中心，西部山區地帶是客家話分布區，中部地帶則是具有某些客家話性質的閩語地區。

方漢人南移與當地少數民族相互影響融合的結果，其分片的差異則主要是移民的遷徙和山川的阻隔所促成。³⁰歷代進入福建的移民都是沿河流上下，或是先在沿海河口建立據點，再向內地及中上游推進，或由上游向下游推進，最終擴及整個流域。福建河流較短，且多獨立入海，在兩條河流之間往往有高大分水嶺阻隔，一個流域常是一個經濟區，經過移民與土著的融合，方言自然接近，在社會、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能維持相對的獨立性。³¹待民系形成後，宋代的行政區劃亦以流域為單位，造成後來方言分區和流域區、歷史行政區間的重合現象。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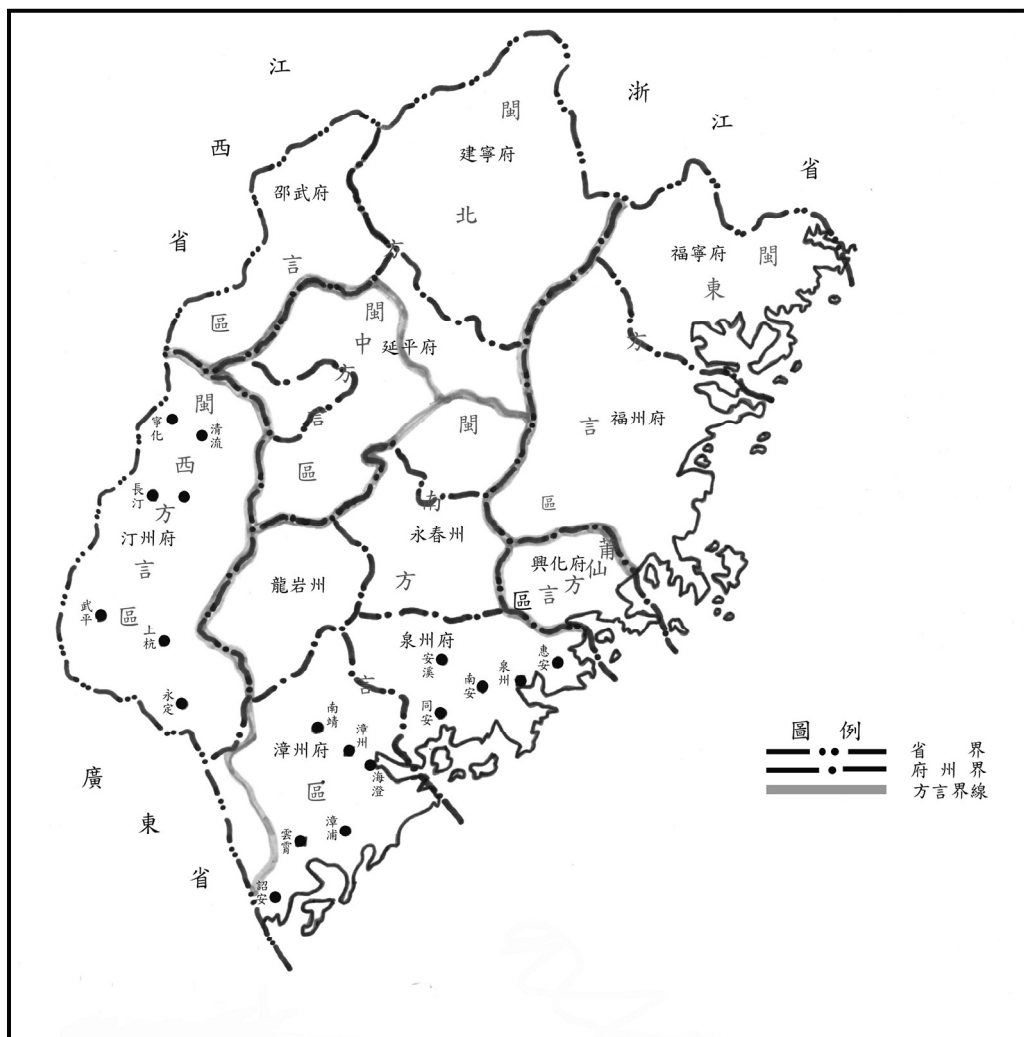
從東望西，閩語的成分逐漸減少，反之亦然。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1987 年），B12；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70。

³⁰ 林汀水：〈略論福建聚落分布的發展變化〉，《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年），頁 17。

³¹ 有學者認為福佬系和客家系都是以中原南遷的移民為主體，部分融合當地的土著形成新的民系。但由於兩地移民形式不同，後來形成兩個不同的民系。二者都含有越文化成分，但由於入遷於漳州的漢人是採武裝移民，一開始便對當地的畬民實行軍事統治，故其文化融合成分罕有畬文化介入；反之，入遷於汀州的漢人則是因避戰亂，與畬民的互動頻繁，因此客家文化明顯有畬文化融入，這也是造成二者語言與文化內容有所差異的原因。參見郭志超：〈閩客民俗宗教的比較研究〉，《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271-301；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285-291。

³² 其中，不能重合的部分，只有南劍州，因為宋末至明初客家人移居閩西，打破原有邊界的重合現象。參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68、71。

圖 3：福建省方言分區圖



資料來源：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林汀水：〈略論福建聚落分布的發展變化〉，《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頁20-21；王恢編繪：《新清史地理志圖集》（臺北：國史館，1993年），頁41-42；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7年），頁42-43。

(一)閩省的福佬語群

漳、泉二府為清代移民臺灣的主要原鄉，此二府即為閩語系中閩南方言的分布區。漳、泉二府一南一北的行政區劃，適代表閩南語區中南北兩片不同口音，二者不僅有著各自獨立的地理區域，其形成時間與方式亦有所差異。泉州府位於晉江流域，開發較早，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先在晉江口設置東安縣（後改南安），六朝後北方移民不斷增多，至唐代於泉州地置武榮州，後改稱泉州。泉州所屬轄境，除了惠安縣建置較遲外，其餘各縣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晉江，均在宋以前設縣，可見泉州府至宋初實已遍布漢民聚落點，也大致完成全境的初步開發。³³泉州方言在唐代已具有閩音的基本特徵，且吸收包括六朝雅言在內的中古中原音韻的大量成分，此為六朝以來泉州土著與中原江淮移民長期交流融合的結果。³⁴

漳州府位於九龍江流域所形成的沖積平原，漳州方言的形成稍晚於泉州，形成方式也不同。泉州方言是北方漢人先落腳於江東，再轉徙至泉州，是自發性移民，漳州方言的移民則是直接由中原南來，且屬軍事性移民。³⁵唐總章 2（669）年，朝廷命陳政為嶺南行軍總督，率 3,600 名府兵入閩，鎮守漳浦。後其子陳元光繼父為將，武后垂拱 2（686）年，置漳州，陳元光任刺史。自陳政起，陳氏四代經理漳州，歷百年之久，為漳州的開發奠定基礎。³⁶然而漳州設置初期，山區一帶仍是蠻獠、土黎聚居地。因此，南來的漢移民多先移墾沿海一帶。北宋所轄四縣中，龍溪、漳浦、長泰即分布於沿岸地帶，而龍岩之設，則是為了管理閩西各地散處居民，當時漳州內陸近山一帶仍有不少地方相當荒涼。終宋代之世，漳州未再設縣。直

³³ 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85；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頁 93、98；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 年），頁 100。

³⁴ 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76。

³⁵ 宋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³⁶ 謝重光：〈「開漳聖王」陳元光論略〉，收於氏著：《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103-117。

至南宋中後期，隨著漳州沿海地區的繁榮及汀州地區的開發，夾在二者間的山區地帶，才有較多移民遷入定居，故至元代又增設南勝縣（後改南靖縣）。明代中期各地流入漳州山區的人數日益增多，行政管理漸有鞭長莫及之感，方又陸續增設二縣，即正德 13（1518）年的平和縣、嘉靖 9（1530）年的詔安縣。至此，漳州山區的行政管理方漸完備。³⁷

雖然北方漢人移墾泉、漳的時間與方式不盡相同，但整體而論，閩南方言自唐中葉已初步形成，其鞏固發展則在北宋時期。經過唐、五代時期北方漢民的不斷遷入，約在唐宋時期，福佬民系內部共同且有別於其他民系的文化特點已經形成，除了閩南方言外，另包括較注重財富追求、較濃郁的海洋色彩等特殊風習。³⁸經過唐宋兩代的發展，閩南地區成為福建省中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區，加上其面向海洋的地理位置，一直以來，均為漢人向外移民的大宗。兩宋時期的閩南人多沿海往南開拓，先是，泉州、莆仙一帶的居民自北宋開始大量南徙漳、潮；至南宋時，漳潮居民又轉徙更南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明清之際閩南人的遷移路線則改為往北謀生（如浙江沿海），甚或向海外發展（如臺灣）。³⁹閩南方言不僅是福建省境內使用人口最多的次方言，加上閩南人的大量向外發展，使得閩南方言的分布遠超過福建省的範圍，省外所通行的閩方言，亦以閩南方言系統為主。

（二）閩省的客家語群

客家方言在福建省的分布範圍約同於唐代的汀州、明清的汀州府。客家先民自晚唐五代間離開中原，初至閩西山區時，當地仍是畬族的生業區域，經濟文化相當落後。如清人楊瀾《臨汀匯考》所言：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⁴⁰

³⁷ 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頁 100-102。

³⁸ 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頁 173、177；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頁 98。

³⁹ 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87、90-91。

⁴⁰ 楊瀾：《臨汀匯考》，第 3 卷，「畬民」。

汀州是福建設治最晚的地區，唐開元年間初設治時，還從福州、廣州和潮州等地移入三千戶實之。⁴¹北方漢人遷入閩西之初，主要居住在汀江兩岸和沙溪上游地帶，至唐代開元 13（725）年及開元 24（736）年，已有黃連縣（後改為寧化縣）和長汀縣之設，可知此時入遷閩西的北方漢人已粗具規模。但終唐之世，閩西的行政建制未有擴大。唐末以降，特別是宋代，客家人遷入閩西的數量愈來愈多，沿汀江和沙溪兩岸向山區拓展，乃又設置了上杭、武平、清流三縣，南宋時再增設連城縣。明成化年間，增設永定、明溪二縣。⁴²

近年有不少研究客家民系的學者，認為客家民系形成於南宋或宋元之際，此可自兩方面來觀察。一是自移民史方面而論，靖康亂後遷入汀贛二州的北方移民人數頗多，且南宋移民幾乎都是直接自北方遷入早期客區。此外，大部分族譜所記載的集體遷移也多發生在宋代。因此，雖然南宋移民及其後裔未必都是客家的源流，但客家的源流主要來自南宋移民應無問題。⁴³二自語言特徵來觀察，客家話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語言面貌；再者，南宋陳一新著之〈跋贍學田碑〉，中有云「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⁴⁴凡此，皆可以之推論客家話在南宋之後已形成。姑且不論客家民系是否於南宋或宋元之際即已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南宋時期開始，在贛南、閩西、粵東地帶已形成特殊方音、特殊風俗及特殊人文面貌，⁴⁵即屬於客家民系的文化共同性已蘊釀而成。

明代王世懋所著《閩部疏》中，曾提及汀、虔一帶的方言，以及居山

⁴¹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290。

⁴² 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頁 123。

⁴³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362。

⁴⁴ 陳一新：〈跋贍學田碑〉，收於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年），第 132 卷，頁 699。

⁴⁵ 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頁 170。

的汀民與臨海漳民之別：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馱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為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為不貲，以舶海為恆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鬥，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⁴⁶

由上可知，時人的觀察中，贛南、閩西的方言間看得出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且與福建東部沿海一帶的方言明顯不同，表示著閩省內的方言界線已明顯浮現。

此外，儘管有學者十分強調閩省境內方言分區和流域區、歷史政區間的重合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閩西客家與閩南漳州的交界地區，從龍岩到南靖、平和、雲霄、詔安，分布著一條南北走向長約 250 公里的雙方言帶。⁴⁷方言的越界，表示後期的再移民現象。據瞭解，此區域的客家人多是宋元之世由贛南入寧化、上杭後，在元明之後轉遷鄰近漳州山區開發的結果。⁴⁸由於兩種方言間會互相影響，所以此一區域的互動現象十分複雜，個別區域的方言差異、人數多寡、實力大小，及行政管理的歷史等均會影響彼此互動的模式和影響的深淺。⁴⁹就漳州南部雙方言交界地帶的情況而言，呈現客家文化圈散落於福佬文化圈的包圍中，因此大致來看，閩南話與客家話之間，通常是前者影響後者多，後者影響前者少。⁵⁰其實，此區

⁴⁶ 王世懋：《閩部疏》（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頁 49-50。

⁴⁷ 此一雙方言帶包括龍岩的大池、孔夫、江山、萬安、紅坊，漳平的雙洋、南洋，南靖的梅林、書洋，平和的九峰、大溪，長樂的峙嶺，雲霄的下河、常山，詔安的官陂、秀篆、太平、紅屋等部分村落。參見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76。

⁴⁸ 林嘉書：《土樓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326；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頁 144-146。

⁴⁹ 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77。

⁵⁰ 據曾少聰對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的比較研究中，可知位於漳州府平和、南靖、詔安等縣的閩南客話區的形成，係約於元末至明代，由於來自汀州永定、寧化等地的客家人遷入閩南地區而形成。閩南客話是在閩西客話的基礎上，由於所處地理位置，使其受到閩南話強烈影響，吸收了許多閩南話的成分，因此與閩西客話在許多共同點中產生

客家文化的侷限性與閩南文化的擴張性不僅表現在語言方面，在風俗文化等方面亦同。如郭志超曾比較汀漳交界地帶，兩組閩南與客家聚落的民俗宗教，結果發現，閩西、粵東、贛南客家地區本土產生的神祇有明顯地域性，對鄰近閩南社區的影響有限，此與閩南本土諸神保生大帝、三平祖師、清水祖師、廣澤尊王、開漳聖王等在閩南被普遍信奉形成鮮明對比。⁵¹

二、廣東省的福佬與客家

中國七大漢語方言區，廣東占其中三個，即廣府方言區、閩南方言區及客家方言區。各方言群的形成，一如福建省方言分區的情形，係由不同來源的移民，在不同的地理區域內，與不同的土著文化形塑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分布形態。各方言群皆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質和風格，其分區大致與所謂的廣東三大漢人民系的範圍相同。⁵²其中，粵方言（廣府民系），⁵³主

一些顯著差異。參見曾少聰：〈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比較研究－以長汀客話和九峰客話為例〉，《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頁303-329。

⁵¹ 郭志超所比較的是兩組閩南與客家社區，一是漳州南靖山區客家人的塔下張姓與閩南人的下版劉姓、另一則是汀州永定湖坑的客家李姓與漳州南靖書洋的閩南肖姓。兩組閩南與客家社區其實皆相距不遠，有的閩南其實是客家家族轉徙閩南人社區後福佬化的結果，可以瞭解在汀、漳交界地帶兩個不同方言群間其實互動頻繁而密切。參見郭志超：〈閩客民俗宗教的比較研究〉，《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271-301。

⁵² 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0-11。

⁵³ 廣州府所轄的珠江三角洲是此一民系的核心地區，亦即「廣府人」、「廣府話」之由來。北方漢人約於唐宋時遷入廣東珠江三角洲，與當地的越人、俚人相互影響融合，逐漸形成特殊的方言和文化特點亦基本形成。約至宋代，廣府系的粵方言及其主要文化特色已經形成，由於吸收的土著文化成分較多，其文化特色較其他民系複雜。參見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43-44、46；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頁18-19。

要分布於珠江三角洲，分布區域最廣，人數也最多。閩方言（福佬系）主要沿海岸線走向分布，一東（潮汕片）一西（雷州片）的板塊狀格局，海洋文化為主要文化類型。客方言（客家系）呈沿山塊狀分布，僅有少數客家板塊和方言島在沿海，山地文化和小流域文化是主要類型。⁵⁴有趣的是，所謂的三大方言群中，除了粵方言即所謂的廣府民系外，客家與福佬皆與閩省相連成片，其形成與自福建省而來的移民密切相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周振鶴、游汝杰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曾指出，廣東的三大漢語方言區的界線，若排除一些後期方言群再移民的部分，基本上與南宋時期的歷史政區界線大致重合。⁵⁵司徒尚紀於《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一書中亦言，廣東主要方言分布區多相連成片，其範圍甚廣，非縣一級政區所能覆蓋，為克服溝通障礙，即保持方言地域分布的完整性，為政者通常會將同方言群劃入同一政區，故語言分布界線每與府州二級政區分界一致。⁵⁶然究其實，自南宋至清，廣東二級政區其實幾經分合。明代廣東政區變化頗大，特色之一是新置縣數多，如從饒平和海陽二縣分置大埔縣、分程鄉大部及興寧一部置平遠縣。⁵⁷但在

⁵⁴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頁 94；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頁 17；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B13。

⁵⁵ 出入的部分有兩段，中段的部分是指新豐、佛岡、龍門宋屬廣州府，但今使用客家話，略有出入。佛岡、新豐、龍門三縣今非純客住縣，這裡的客家人係明末、清初及晚近移入，明之前這一帶應是粵語天下。三縣以東以北均是純客住縣，如河源、翁源、英德。這些純客住縣的客家人早在五代後就移入，所以南宋時中段和政區界也完全吻合，即廣州和韶州、英德、循州的分界線吻合。東段的部分係指中段粵東閩南話和粵語的分界線和宋政區界線不能吻合，不過東段的出入僅二縣。大埔和豐順舊屬潮州府，今通用客家話。大埔和豐順的客家人多是宋末自閩西移入。但在梅縣一帶北宋末期客家移民已占多數。因此南宋時代客家話和潮州話的分界線應在大埔、豐順北，即與梅州和潮州政區分界相吻合。參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98-99。

⁵⁶ 如明清時代的廣州府、肇慶府、高州府基本包括廣府方言區；清嘉應州、明清惠州府、韶州府、南雄府（州）基本上包括客家方言區；明清雷州府、瓊州和清代潮州府，包括閩南方言區。參見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頁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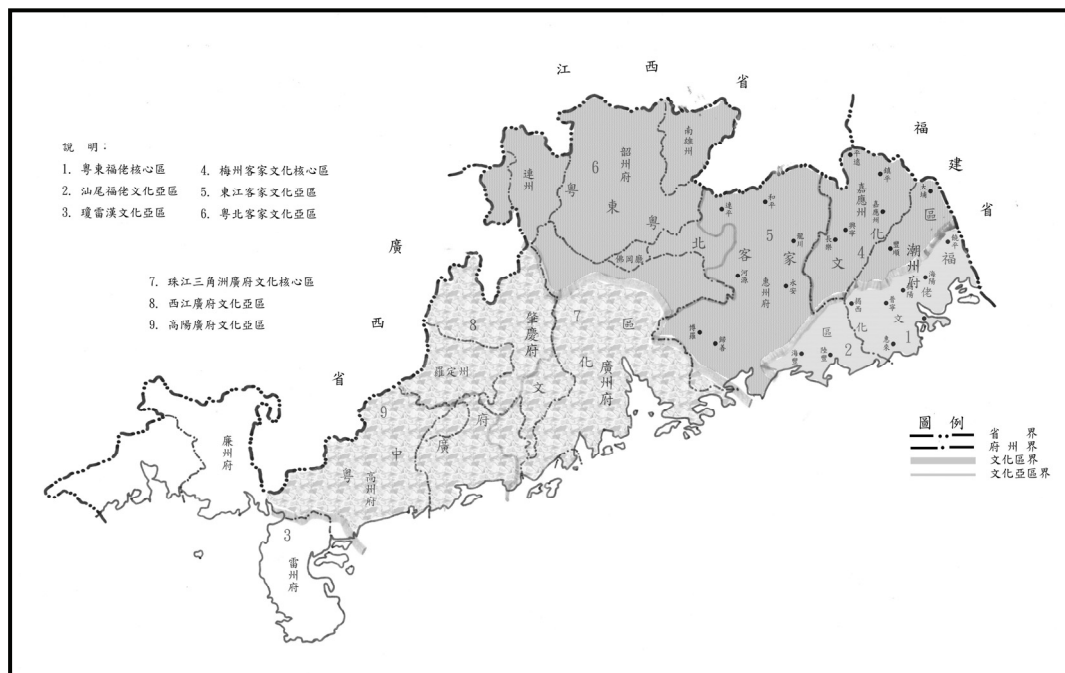
⁵⁷ 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頁 55；賈鶴：〈略述客地明代社

二級政區部分卻打破了方言群與政區的重合關係，如在南宋及元時原含括客家方言群的梅州、循州，至明朝被分別併入潮州、惠州。因此，自明至清初，所謂的潮、惠二州，其實混雜了兩種不同的方言人群，即當時的政區並未能反映不同方言人群的分界。直至雍正 10（1732）年，廣東總督鄂彌達以潮州府屬之程鄉、平遠、鎮平三縣，俱在蓬辣灘以北，距府城遙遠；惠州府屬之興寧、長樂二縣，在藍關以東，亦距府遙遠為由，奏請將此五縣另置為一州，以便治理，且以地理位置適中的程鄉為州治所在，易名為嘉應州。⁵⁸雍正 11（1733）年，潮、惠二州各釋出州內客家方言群地帶另立嘉應州廣東的政區才又因應地理形勢與實際需要，劃出符合方言人群的分界。

會概況與客人外遷》，《客家研究輯刊》，1994：1（1994 年 3 月），頁 175-202。

⁵⁸ 周碩勳重修：《潮州府志》（臺北：成文，1760 年原刊），頁 997，「廣東總督鄂彌達為改請州縣轄屬以便吏治民生」。

圖 4：廣東文化區劃圖



資料來源：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430。

(一) 粵省的福佬語群

廣東閩方言可分為東西兩區。粵西閩語分布於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沿海，其形成晚於粵東閩語，是閩潮移民從宋代開始沿粵東沿海，繞過粵語區，跳躍式前進開發的結果。由於閩南方言群移民的流動，使此二地亦納入閩南方言區範圍。⁵⁹與清代移民臺灣有關的福佬方言群，在廣東的部分，主要來自所謂粵東閩語的潮汕地區，其分布狀況可略分為兩大區塊，一是「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區」，包括三陽（揭陽、潮陽、海陽）、饒平、惠來、澄海、普寧、揭西、南澳等縣，該區居民主要來自福建，且幾乎全部使用閩南語。二是「汕尾福佬文化亞區」，包括惠州府屬的海豐、陸豐、陸河縣，

⁵⁹ 林倫倫：〈廣東閩方言語法特點的比較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9 卷 2 期（1993 年），頁 59；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頁 10。

及揭西、普寧、惠來的一部分。此區雖以福佬文化為主，但由於自古以來即為一群山環抱，相對獨立的地域單元，且由於多少受到鄰近客家文化及廣府文化的影響，文化混雜的現象較明顯。⁶⁰

整體來看，整個潮汕平原在地理位置上，不僅與屬福佬語系的閩省漳州相連成片，且同是東南沿海的一部分，因此，很自然地成為福建人民另闢樂土的最佳選擇。自唐代開始，福建移民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地向粵東遷徙。兩宋之交、宋元時期、明代，是閩人遷入粵東沿海平原的三大高峰期。⁶¹從唐到清初，從福建遷來的家族占全部遷入家族的 70.91%，⁶²可見粵東福佬語區的形成與福建移民關係密切。大量遷入潮汕平原的閩南移民，帶入了閩南方言和地域文化，因此潮汕人往往被稱為「福佬」，⁶³潮汕方言與閩南方言同一系屬，潮汕文化也與閩南文化近似，海洋文化為其主要特點。

閩、潮間的密切關係，可以由一些史籍資料加以參照印證。如宋代的福建人陳藻曾著〈過海豐〉，言「忽聽兒音鄉語熟，不知方到海豐城」，⁶⁴可見當時的海豐有一定數量的福建移民。再者，南宋初期，胡寅在提及廣東時，曾言「緣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⁶⁵可知當時有許多廣東的居民是福建移民及其後裔。因此，即使在行政區劃上被分為閩粵二界，但就方言群分布或地域文化屬性來看，其範圍其實是超越省籍之界，而這個現象，宋人王象之已有所描述：

⁶⁰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94、397-398。

⁶¹ 根據黃挺的研究，明代由於實行海禁，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移民遷入潮汕地區。據其所做的統計，揭陽縣榕江流域於明代所創建的村落有 107 個，較宋元以前建村總合多 91 個。其中，從福建遷入者占三分之二。此外，潮安縣浮洋鎮，全縣有 94 個自然村，其中 61 個建於明代，其中從福建直接遷入者有 30 個，餘自各縣輾轉遷入者，亦多來自福建。參見黃挺：《潮汕文化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68。

⁶² 黃桂：《潮州的社會傳統與經濟發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00-102。

⁶³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頁 46。

⁶⁴ 陳藻：《樂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 2 卷。

⁶⁵ 胡寅：〈代人上廣帥書〉，《斐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7 冊），第 17 卷。

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福建之語。人文郁郁，自韓公趙德而來。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鱷遠徙。掃除青草黃茆之瘴霧，髣髴十洲三島之仙瀛。眷今古瀛，實望南粵，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⁶⁶

明人王士性亦曾言：

潮州為閩越地。自秦始皇屬南海郡，遂隸廣至今。以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為是。……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廣。且既在廣界山之外，而與汀、漳平壤相接，又無山川之限，其俗之繁華既與漳同，而其語言又與漳、泉二郡通，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故曰潮隸閩為是。⁶⁷

此外，關於潮州府沿海各縣在語言上偏近閩音，且風俗相近的情形，在許多地方志中亦有記載，如乾隆年間所修之《潮州府志》中所言：

潮人言語侏侑，多與閩同，故有其音而無其字，與諸郡之語每不相通，如髻曰莊、鬚曰秋……。⁶⁸

潮民……其風氣近閩，習尚隨之，不獨言語相類矣。⁶⁹

《揭陽縣志》：

粵東各府聲音大約相近，惟潮郡與閩之漳泉同，揭潮屬邑也，亦囿於俗，往往有其音而無其字，與諸郡之語每不相通，如天曰梯，風曰荒……。⁷⁰

乾隆《澄海縣志》：

潮屬海潮揭三邑，故家右族多來自閩漳、泉二郡，饒平半之

⁶⁶ 王象之：《輿地紀勝》，第100卷，廣南東路·潮州。

⁶⁷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廣志釋〉，第4卷，廣東。

⁶⁸ 周碩勳重修：《潮州府志》（高雄：高雄市潮汕同鄉會，乾隆年原刊，1968年），頁124。

⁶⁹ 周碩勳重修：《潮州府志》，頁130，第5卷，風俗。

⁷⁰ 劉業勳修，凌魚纂：《揭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頁885。

澄邑，從海、揭、饒分設，故其言語侏侑，與漳、泉同，多有音無字，風土所囿，迥殊嶺北，即有字可舉，似者亦與本義本反。⁷¹

綜上可知，同屬福佬語群的閩潮間雖有省界之劃，但表現在方言、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粵東的福佬語系與廣東省其他語系間的分立現象卻日益明顯。清嘉慶年間鄭昌時所著《韓江聞見錄》一書中曾言：

今考鄉音之異，莫甚吾潮。蓋潮在海濱，古稱揚州外裔，去中土最遠，故言語聲音，去正音亦最遠也。……又按潮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說白話者之土歌，為峯歌，為秧歌，說客話者之土歌，為採茶歌、山歌，各以鄉音叶韻。而客音去正音為近。白話南北行不能數十里，惟東走海濱，則可達福建之漳、泉；西濱海，又間達本省之雷、瓊，不下千餘里也。⁷²

由此可知，清朝中葉的鄭昌時已意識到潮州話與漳泉話、雷州話、海南話屬同一系屬，以及同屬粵省內之潮州話與客家話的差異情形。⁷³

(二)粵省的客家語群

廣東三大民系中，以客家民系形成最晚。宋人祝穆《方輿勝覽》卷36「梅州」中言，「風俗土曠民民惰……而業農者鮮，悉借汀、贛僑寓者耕焉」。⁷⁴可知南宋後期，梅州已有相當數量來自汀州和贛州的移民。但由於宋元之際

⁷¹ 陳鍊等修，鄧廷祚等纂：《澄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乾隆27年原刊），第6卷，風俗，頁69。

⁷² 鄭昌時：《韓江聞見錄》（香港：香港潮州會館，1979年），頁172-173，卷10，「鄉音同異可通韻學說 備論潮音」。

⁷³ 鄭昌時為海陽人，海陽為潮安之古稱。鄭昌時所描敘的應是清中葉潮州府城一帶的語音，即當時的潮安音。參見李新魁：〈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9卷1期（1993年），頁74。

⁷⁴ 祝穆：《方輿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1冊），史部229地理類，第36卷，頁843。

的戰爭，使梅州地區的戶口折損嚴重，因此，一般認為，來自閩西、贛南的客家人約在宋末元初之際，才陸續南徙廣東省境。⁷⁵一如廣東的福佬語群是閩南福佬移民流動的影響，廣東客家話的分布主要是汀、贛客家南移的結果，尤其是福建省汀州府移民，即如康熙《程鄉縣志》所載：

以一郡言之，則郡人土音近於漳泉，程人土音近於汀贛。⁷⁶

亦如黃遵憲所言：

客人來州，多在元時。本河南人。五代時，有九族隨王審知入閩，後散居八閩。今之州人，皆由寧化縣之石壁鄉遷來，頗有唐魏儉嗇之風。禮俗多存古意，世守鄉音不改。故土人別之曰客人。方言多古語，尤多古音。⁷⁷

初入廣東省境的客家人，面對廣府、潮汕兩大民系東西兩分的態勢，只能進壑粵北、粵東相連成片的山區，也因此無可避免與原有民系發生利益衝突，造成客家方言群更強調以語言作為群體標誌。⁷⁸當時的梅州、循州與其相近的大埔是客家人主要的遷入地，⁷⁹元末明初期間，復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贛二府轉徙廣東境內墾殖定居，如《嘉應州志》所載：

故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為近，其傳次亦相上下，約在二十餘世之間。……今所

⁷⁵ 依據吳松弟由《客家資料匯編》、《寧化客家研究》等書及自己採集的族譜資料所製成「廣東客家系移民實例」一表中，南宋末、宋元間、元代等期間內遷入廣東省的客家家族，占全部的 46.3%，由此可知當地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是在宋元之際和元代此一期間遷入廣東，即是這些氏族對廣東客家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作用。參見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188。

⁷⁶ 劉廣聰纂：《〔康熙〕程鄉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 1 卷，頁 375。

⁷⁷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箋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頁 289。

⁷⁸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頁 92。

⁷⁹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190。

謂土著，既多由汀贛而來，其言語聲音又與相近。⁸⁰

大量的客家移民南移入粵，使粵東、粵北山區得以充分開發，明成化年間更是閩西客民向粵北入遷的高峰期，粵北人口因此開始回升。⁸¹因此，有學者認為閩西、贛南是客家的搖籃地，客家方言形成於閩贛，最後定型於廣東。⁸²綜上可知，一如閩潮，廣東省境內的客家，與其北境的閩省汀州府，無論在親屬關係、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上，同樣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才會有「汀州雖閩郡，近粵情無歧」的現象。⁸³

客家方言群在廣東的分布，徐旭曾在嘉慶 13 年所作之〈豐湖雜記〉中曾言：

當時元兵殘暴，所過成墟，粵之土人，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其閩、贛、湘、粵邊境，毗連千數百里之地，常有數十里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穫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遂別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終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義之後，其孰能之？⁸⁴

光緒年間的《嘉應州志》對客家方言群在廣東省境內的分布則有以下

⁸⁰ 溫仲和：《嘉應州志》（臺北：成文，1898 年原刊），頁 122。

⁸¹ 林立芳、莊初升：〈粵北地區漢語方言概況〉，《方言》，2000：2（2000 年 5 月），頁 126-137。

⁸² 李如龍：《福建方言》，頁 101。

⁸³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70 種），頁 326，「曉滄惠香米兼以詩貺賦此為謝並送之汀州」。

⁸⁴ 徐旭曾：〈豐湖雜記〉（嘉慶 13 年），轉引自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編》（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頁 126。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州、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⁸⁵

徐珂《清稗類鈔·方言類》中「廣東有客話」：

廣東之南雄州、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州五屬，及廣州之花縣、龍門、清遠，潮州之大埔、豐順等縣，均操客話。蓋土著以其後至，故稱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為客話。其語之節奏句度，較之內地不甚相遠，實與六朝音韻相同。⁸⁶

三者相較，《嘉應州志》所言之客家分布範圍，主要集中在嘉應州及潮、惠二府各縣中，事實上只有司徒尚紀對廣東省所作的文化分區中，客家文化區中的「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區」⁸⁷與「東江客家文化亞區」，⁸⁸並未及於另一客家文化亞區「粵北客家文化亞區」（參見圖4）。⁸⁹綜之亦可了解，客家方言群在廣東省，主要分布遍及清之嘉應州、惠州府、南雄州、韶州、連州，並擴及潮州府及廣州的一部分縣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如福建省內汀漳間的雙方言混雜地帶，廣東省在嘉應州、惠州與潮州的交界山

⁸⁵ 溫仲和：《嘉應州志》，頁121。

⁸⁶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方言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28。

⁸⁷ 即舊治嘉應五屬梅縣、興寧、五華、平遠、鎮平，及潮州府大埔、豐順一部分，為客家人集中分布之地，是客家文化典型代表。參見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頁399。

⁸⁸ 為自嘉應州向外擴展客家文化亞區之一，位於九連山與蓮花山之間的東江流域，相當於清代惠州府大部分疆域，包括今惠陽、惠州、惠東、博羅、紫金、河源、龍川、和平、連平等縣。參見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頁404。

⁸⁹ 本區包括北江及其支流連江、潁江、武江、翁江及琵琶江等流域，含南雄、始興、翁源、仁化、樂昌、曲江、韶關、英德、清遠、乳源、連縣、陽山、連山、連南、佛崗、新豐、從化等縣，為客家文化區在廣東占地最廣的區域。但此區自然環境複雜，民族成分多源，客家移民遲至明清時期才在人口比例和空間上漸占優勢，但仍頗受廣府文化與土著文化的影響。參見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頁406-409。

區地帶，亦存在一條與山脈走向平行的雙語流行地帶，如饒平、⁹⁰揭陽、⁹¹揭西、⁹²陸豐、陸河、海豐三縣北部山區。⁹³林浩將廣東福佬與客家方言群的接觸面，即饒平－潮州（海陽）－揭陽－揭西－陸豐－海豐，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地帶，稱之為「客家·福佬文化接觸的饒豐鋒線」，以此鋒線為軸，呈現客家文化向外、福佬文化向內的拉鋸影響。⁹⁴

⁹⁰ 饒平東及東北部與福建省詔安、平和兩縣接壤，北與廣東大埔縣毗鄰，西和西南與豐順縣、潮安縣、澄海縣交界，南瀕南海與南澳島相望。地處客家方言和閩方言交界地帶，全縣通行兩種方言，中部、南部，包括黃岡、錢東、海山、柘林、高堂、聯饒、東界、浮山、浮濱、新圩、樟溪、三饒等鄉鎮均說閩方言系統的饒平潮汕話。使用人口 60 多萬，占全縣人口 80%。北部靠近大埔縣、平和縣的上善、上饒、饒洋、九村、建饒等鄉鎮，及新豐鎮的大部分鄉村，約占全縣人口 19%。饒平潮汕話以縣城黃岡話為代表，語音系統與汕頭話很接近。饒平客家話稱上饒客話，饒平客話的部分方言詞，與粵東以梅縣話為代表的客家話相同，有些則是別處客家話看不到的，部分與潮汕閩語相同。詹伯慧：〈廣東省饒平方言記音〉，《方言》，1993：2（1993 年 5 月），頁 129、138；林倫倫：〈廣東閩方言的分布及語音特徵〉，《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8 卷 2 期（1992 年），頁 54；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451。

⁹¹ 揭陽縣內，除西北部與豐順、揭西交界的玉湖、龍尾、新亨、桂嶺、白塔等地為福客雙方言區外，其餘皆為潮汕方言區。林倫倫：〈廣東閩方言的分布及語音特徵〉，頁 54；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頁 323、451。

⁹² 揭西縣內，河婆鎮以北、與豐順、五華交界地帶為客方言區或福客雙方言區。與揭陽、普寧、陸河三縣交界的東園、鳳江、棉湖、塔頭、金和、大溪、錢坑、坪上諸鎮則為潮汕方言區。揭西客家方言面積占全縣 79.6%，以縣城河婆話為代表；潮汕方言面積占 26.6%，以棉湖話為代表。客家方言區所占面積雖遠大於潮汕方言區，但潮汕方言地區的人口密集度高於客家方言區。林倫倫：〈廣東揭西縣方言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0 卷 3 期（1994 年），頁 82-83；林倫倫：〈廣東閩方言的分布及語音特徵〉，頁 54。

⁹³ 海豐、陸豐、陸河主要屬福佬語區，但在海豐北部，接近惠來縣北部一帶的平東及黃羌鎮及所屬的高北、東嶺、七連、石門、石金、石敢及銀豐、萬福等鄉村，及西北部與惠來縣相接的鵝埠鎮、赤石鎮所屬的大鞍、新連等地，均有部分人講客家話。陸河縣（原屬陸豐西北部）北部接近五華、紫金東部，及與揭西交界的南萬、螺溪等鄉鎮有部分人使用客家話。陸豐則是在大安、西南、河西、八萬、陂洋、南塘等鄉鎮，約占全縣 20% 的居民使用客家話。參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頁 451；林倫倫：〈廣東閩方言的分布及語音特徵〉，頁 54-55。

⁹⁴ 林浩：〈客家文化新論〉，《客家研究輯刊》，1997：1（1997 年 3 月），頁 19。

客家方言一直是辨認客家族群身分的重要標誌，尤其身處生業不易的山區，以及其他民系已各據一方的廣東省，客家方言更是族群認同的重要依據。即如清人羅翹雲在所著《客方言》的自序中所言：

夫客之先自中原轉徙而來，凡土田肥美之鄉，水陸交通之會，皆先為土著占據，故所居多在山僻陵谷，隔絕山川間阻，保守之力因之益強。語音不變，此為大原矣。⁹⁵

清代廣東各民系間方言與風俗的分野，由清嘉慶年間徐旭曾所言亦可瞭解：

客人語言，……，惟與土人之風俗語言，至今猶未能強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彼同也，故仍稱吾為客人。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⁹⁶

或許基於各方言群對我群的認同，致使廣東三大方言群中長期存在衝突關係，即如徐珂《清稗類鈔·方言類》中所言：

粵省土語，略可分為三種。一廣州語，一客語，即嘉應州語，一福語，即潮州語。此種語言絕不相似，幾無一字可通。因語言之隔閡，感情亦因而薄弱，故時起抵觸。且因壤地相錯，利害密切，其抵觸較諸與他省之抵觸者為尤甚。⁹⁷

(三)小結

綜上可知，福建省的方言分布主要以閩語與客家話為主，而廣東省內則大體上分屬粵、閩、客三大方言鼎立之勢。此種態勢的呈現，均是因為不同時期的北方漢移民，與在地之百越、閩越、畚族等土著民族互動與融合的結果。從移民流動的路線與方言分布的情形來看，廣東省境內粵東沿

⁹⁵ 羅翹雲：〈客方言自序〉，《客方言》（古亭書屋），頁17。

⁹⁶ 徐旭曾：〈豐湖雜記〉，頁299。

⁹⁷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方言類》，頁28。

海各州縣的福佬方言群與粵東、粵北山區的客家方言群，其實亦是北方移民於福建省內停留一段時期後再遷徙的結果，兩大方言群都存在著超越省界的密切關係。由此，或可進一步深思，清領臺之初，臺地官員所認知的，或文獻資料上所呈現的所謂閩粵籍民，省籍的原則並不足以界定人群的結合情形。尤有進者，當時官員對渡臺粵民，雖均以「惠、潮」民人概稱，或者後期一律統稱「粵民」，但究其實，移民臺灣的漢人，不論是來自福建或廣東，在省籍的界定內，實存在語言及文化的明顯差異。

此外，若由祖籍概念來瞭解族群關係，政區的範圍是其主要依據，但政區內的複雜性及政區本身的變動性將使祖籍或鄉黨概念無法清楚地界定族群屬性。如明至清初的廣東省二級政區正處於無法反映不同方言人群分界的調整階段，雍正 11 年以前的潮州府與惠州府，尤其是潮州府，其政區內實包含了客家與福佬兩大民系。至雍正 11 年以後，才自潮、惠二府中析出屬於客家方言區域，另立嘉應州。因此，除了對於雍正 11 年以前來臺的潮、惠二府粵省移民的族群屬性必須謹慎界定外，亦需瞭解雍正 11 年前後所謂的「潮州府」，其實有著不同的人群意涵。

再者，與來臺漢人有關的廣東三大州府中，嘉應州可視為純客住居，但潮州府與惠州府的部分就比較複雜。潮州府境內，有福佬語區、純客語區（大埔），及福客混雜區（饒平）；惠州府境內的情形亦類似，存在有福佬語區、客語區及粵語區。福建省部分，汀州府與泉州府比較單純，但漳州府的部分，亦存在福佬與客家方言人群的混雜區。因此，若以祖籍地來理解移民的族群認同時，就必須非常小心，即單從潮州府、惠州府或漳州府，並不能斷定其語系或族群認同。其族群屬性的追溯，可能必須到村庄的層級方能更正確分析其可能的認同。而且，由於這些雙語交界地帶的居民，其在原鄉與其他方言人群的互動經驗，必然會對他在新居地的族群認同產生影響，至少相較於其他居住於較封閉的純方言人群的移民而言，其對其他人群無論在語言或風俗文化上接受度均較高，且族群認同的變異性相對更大。

叁、清代屏東平原的語群分類情形

屏東平原是臺灣第二大平原，在清代稱為「下淡水」，所謂的「下淡水」，在清代的認知，係指西至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東至當時之番界、北至羅漢門（今旗山鎮附近）、南瀕海的一帶平野。⁹⁸以今日的理解，即北至今高雄縣旗山鎮、屏東縣高樹鄉附近的玉山山脈南端，南至東港、枋寮的海岸線，西以高屏溪與高雄平原為界，東為潮州斷層崖。康熙 58（1719）年，屏東平原以貫流平原中央的東港溪為界，分東西二部，東為淡水港東里、西為淡水港西里。道光年間，分別簡稱為港東、港西里。至光緒 14 年，北以武洛溪、隘寮溪等自然地形為界，更分為港西上里、港西中里、港西下里；南則以後寮溪、林邊溪更分為港東上里、港東中里、港東下里。⁹⁹

以下將以發生於康熙及道光朝的兩起分類械鬥事件，分析清代屏東平原漢人族群分類之實際情形。

一、清代屏東平原語群分布概況

由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於昭和元（1926）年所做的臺灣在籍漢民鄉貫調查中可知，當時屏東平原中福建省移民除屬客語區的汀州府系外，計占 45.4%，其中以漳、泉二府占多數。廣東省移民中，潮州府占 2.4%、嘉應州占 20.77%、惠州府占 0.35%（參見表 1）。

⁹⁸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之部》（東京：富山房出版社，1909 年），頁 154-159。

⁹⁹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之部》，頁 154。

表 1：屏東平原漢人鄉貫分布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	總計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州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旗山郡	旗山街	102	10	5	4	1	1	3	5	5	2	4	
	美濃庄	0	2	--	--	--	--	--	--	171	--	1	
	杉林庄	2	1	--	--	--	--	--	--	17	--	3	
	甲仙庄	1	1	--	--	--	1	--	--	1	1	14	
	內門庄	24	24	--	2	--	--	19	--	--	--	21	
	田寮庄	37	54	--	--	--	--	--	--	--	--	--	
屏東郡	屏東街	185	22	6	5	--	--	--	4	8	3	5	
	長興庄	0	24	--	--	--	--	--	--	96	--	1	
	鹽埔庄	19	20	--	9	8	3	5	15	4	2	--	
	高樹庄	14	7	--	--	--	18	3	7	37	--	9	
	六龜庄	18	8	4	--	--	--	--	7	6	4	--	
	里港庄	32	27	--	--	6	3	5	2	2	--	--	
	九塊厝	26	28	--	--	--	--	--	2	1	--	--	
潮州郡	潮州庄	22	24	--	--	--	--	--	22	6	--	--	
	萬巒庄	11	6	--	--	--	--	--	11	66	--	--	
	內埔庄	6	30	--	--	--	--	--	--	144	--	--	
	竹田庄	16		--	--	--	--	--	--	59	--	--	
	新埤庄	0		--	--	--	--	--	5	35	--	--	
	枋寮庄	16	63	--	--	--	--	--	--	1	--		
	枋山庄	14	10	--	--	--	--	--	--	--	--		
東港郡	東港街	96	47	--	--	--	--	--	--	--	--		
	新園庄	86	78	--	--	--	--	--	--	--	--	1	
	萬丹庄	135	9	--	--	--	--	15	--	--	--	1	
	林邊庄	69	33	--	--	--	--	--	--	--	--	1	
	佳冬庄	30	2	--	--	--	--	--	3	58	--	1	
小計		961	530	15	20	15	26	50	83	717	12	62	3,452
百分比		27.84	15.35	0.43	0.58	0.43	0.75	1.45	2.40	20.77	0.35	1.80	1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年3月），頁24-27。

閩粵二省的漢移民，包括福佬、客家，約自康熙三十年代之後，陸續進墾屏東平原。至康熙末年，福佬系占墾的地區，主要分布於下淡水溪沿岸和沿海一帶，即北自阿里港，南到東港，並沿海岸平原南下直達枋寮，皆成福佬村落的散布地帶；而客家系則自萬丹沿麟洛溪（隘寮溪的舊河道）和東港溪向上游及兩岸發展，而形成福佬和客家各據屏東平原東西兩側的族群分布特徵。¹⁰⁰

¹⁰⁰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頁 35。

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社。¹⁰¹

上述之鎮平、程鄉、平遠、大埔等縣，當時隸屬廣東省潮州府；永定、武平、上杭等縣則為福建省汀州府。因此，就清代官員在康熙末年的觀察而言，當時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的六堆聚落，其實是來自閩粵二省。

定墾屏東平原後的福佬與客家兩大語群的相處情形如何？其實早在清領臺之初的康熙年間，二種語系的人群已呈現各分氣類的現象，據當時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的觀察可知：¹⁰²

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¹⁰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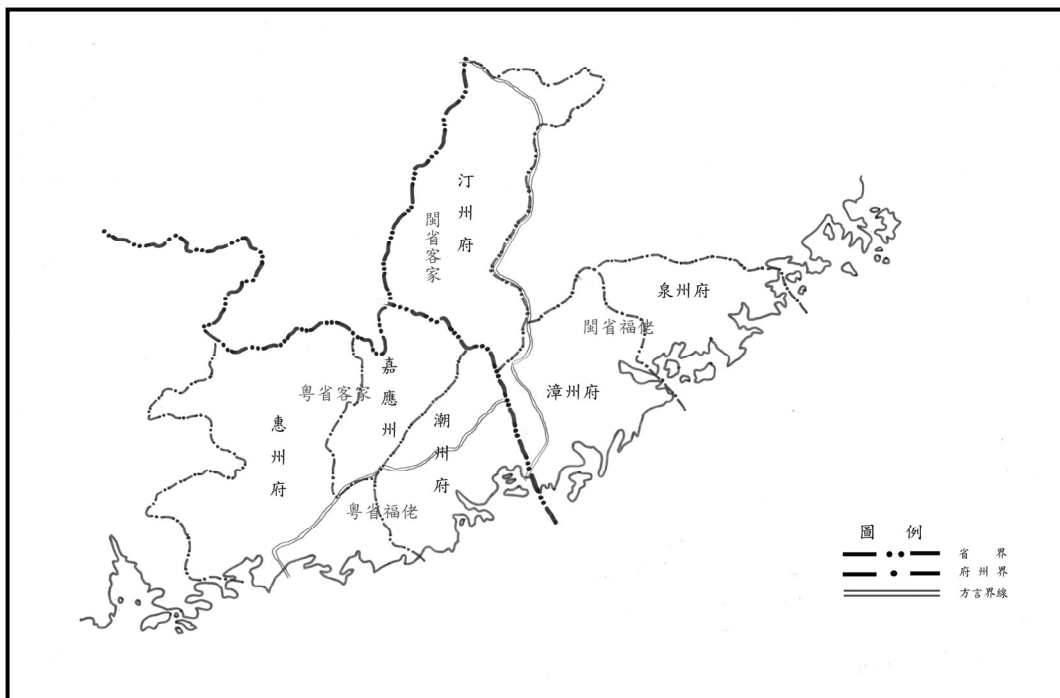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閩粵二籍自原鄉移民臺地之初，人群結合的模式就不必然以省籍區分。因此，若我們仍只是以單純的省籍來區分清代漢人的族群關係，貿然將「閩粵」關係等同於「福客」關係，可能會造成許多誤解，也可能因此在史料中迷失，找不到事實的真相。由圖 6 可知，以往學者在處理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時，多以橫向的省界為分類標準，但若瞭解廣東省乃至福建省民系或語系的分布後，其實應將縱向的語群分界亦納入考量，藉由省籍與語言界線所穿插出來的四個區塊，可以更清楚地瞭解清代來臺漢移民間人群的結合情形。

¹⁰¹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敘疏〉，《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以下簡稱文叢〕，1764 年原刊），頁 343。

¹⁰²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敘疏〉，頁 343。

¹⁰³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頁 343-346。

圖 6：閩粵省籍與福佬、客家族群關係示意圖



二、由朱一貴事件看人群的分類變化

朱一貴事件在臺灣史上有其特殊意義，不僅是清領臺之後首件蔓延全臺的民變，更是清代臺灣閩粵分類械鬥之始，自此而後，二者關係日益惡化。¹⁰⁴臺灣史上首見的漢人分類衝突隨朱一貴事件而起，因此整個事件由民變轉為械鬥的過程頗值玩味。再者，整個朱一貴事件從表面上看來，係由閩粵結合演變成閩粵分類，但其中的分類界線並不僅止於省籍，其中實有語群分類的作用在內。因此，本文希望能釐清整個朱一貴事件自始而終

¹⁰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第4種，1722年原刊），頁93，「朱逆附略」中，即言「辛丑變後，客民與閩人不相和協」；林師聖：《臺灣采訪冊》（文叢第55種），頁34-35，「閩粵分類」中，亦提及「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亂，……此閩粵分類之所由始也」，且「其禍（閩粵分類）自朱逆叛亂以至於今，仇日已結，怨日以深，治時閩欺粵，亂時粵侮閩，率以為常，冤冤相報無已時」。

人群分類的變化情形，以深入瞭解臺灣史上第一起閩粵械鬥事件的過程，以及其中各分類人群的內涵與差異性。

朱一貴事件之起，可說是閩粵二籍勢力的結合，結局卻以二籍分類的結果收場。今人在論述朱一貴事件期間的閩粵關係時，多未察覺其中閩粵二籍中各語群人民結合與分立的問題，而逕自以閩粵分籍械鬥的觀點一以貫之。近來，對臺灣族群關係的研究，相較於已往簡單地以省籍區分漢人族群，雖已經逐漸瞭解語群分類的重要性，但其中卻仍有太多含混不清之處，尤其是對潮屬三陽之人如何看待的問題。過去，常以簡單的「粵即客」的區分概念，認為杜君英是客家人，即使是近期的研究，對杜君英究竟屬於福佬或客家，仍是定義不明。¹⁰⁵因此，有人認為朱一貴事件發生後，客家人以軍事防禦組織與朱一貴等閩籍的對立，常被視為是杜君英與朱一貴分裂後，響應杜君英之舉。¹⁰⁶僅僅一樁朱一貴事件，就常令許多人難以釐清究竟是閩粵械鬥，還是福客械鬥？其實，杜君英常令人誤以為他是屬於客家語群的原因，除了他的粵民身分外，也與其生業之處屬於客家人聚居地區（今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有關。但就本文之前的論述，可知清領臺之初屏東平原上的潮屬三陽等潮州語系移民，其實是「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與當地的客家語系移民不相類屬的。

朱一貴事件之起事，為朱一貴與杜君英二大勢力的合流。朱一貴係漳

¹⁰⁵ 如許文雄在所發表的〈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福佬客家械鬥〉中，將潮陽、海陽、揭陽，因會說閩南話，和漳州泉州的福佬聲氣相通的人，視為是來自潮州的客家。因此認為臺灣最早的福佬客家械鬥是 1721 年朱一貴和杜君英的部眾在府城相打開始。參見許文雄：〈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福佬客家械鬥〉，收於《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頁 152、167。

¹⁰⁶ 簡炯仁認為，操河洛話的杜君英，因為是客家拓墾區的隘首，卻被認為是客家人。因此，朱一貴或林爽文登高一呼，講河洛話的人就跟著他，杜君英則有眾多客家人附會他。因此，叛軍進入臺南府城，朱一貴與杜君英的內訌，進而演變為閩客衝突，屏東平原的客家聚落迅速凝聚成六堆，促成當地的閩客分類。參見簡炯仁：〈高屏地區土地開發與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2 期（1999 年 6 月），頁 12。

州府長泰縣人，¹⁰⁷杜君英為潮州府海陽縣人，¹⁰⁸如上所述，杜君英係粵屬福佬語系，因語言文化的關係，杜君英等雖為粵人，卻與閩人較為契合。也因此，與杜君英共同起事於下淡水地區的，除其所處庄里附近的「粵東種地傭工客民」外，大部分為閩人，如起於草潭的郭國正、翁義；起於下埤頭的江國論；起於新園的林曹、林騫、林璉；起於小琉球的王忠等。¹⁰⁹而杜君英起意糾眾叛亂，亦是聽從閩人柯妹之建議。¹¹⁰由此可見，朱一貴事件的起事團體最初的結合是超越省籍界限的，而且係福佬語系的跨省連結。透過朱一貴與杜君英兩大陣營由合作到分裂的過程，可以瞭解閩粵二籍分類的原因與始末。

康熙 60（1721）年 3 月，因避罪而匿居於下淡水檳榔林（今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的杜君英得知知府王珍施政引起民怨後，乃糾集庄里附近的陳伯、莊勳、黃捷、陳會等粵人，李國彥、李國恩、陳貴等閩人，以及臺灣府民蕭伯、鄭十三等五十餘人，於 3 月初 10 日豎旗倡亂。後有楊來、顏子京、戴穆、劉國基、陳福壽、洪正、王義生、郭國正等各執旗色前來加入，共集一千餘人。¹¹¹無獨有偶，鳳山縣民朱一貴由於結黨聚眾遭知府王珍往捕未獲，¹¹²4 月 19 日，乃與李勇、吳外、鄭定瑞等 52 人焚表結盟，之後各自會人，共糾得千餘人，立「大元帥朱」、「激變良民」、「大明重興」等旗幟起事。¹¹³

事起之初，兩大陣營尚各自行動。康熙 60（1721）年 4 月 19 日，朱一貴等夜襲岡山、檳榔林、大湖等汛，擊敗汛防把總張文學，且搶奪烏鎗、藤牌等軍械。21 日，杜君英主動遣楊來、顏子京率眾越渡下淡水溪，至溪

¹⁰⁷ 《臺案彙錄己集》（文叢第 191 種），頁 2。

¹⁰⁸ 《臺案彙錄己集》，頁 18，「朱一貴謀反殘件」。

¹⁰⁹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2。

¹¹⁰ 《臺案彙錄己集》，頁 18，「朱一貴謀反殘件」。

¹¹¹ 《臺案彙錄己集》，頁 18-19，「朱一貴謀反殘件」。

¹¹² 《清聖祖實錄選輯》（文叢第 165 種），頁 174，「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

¹¹³ 《臺案彙錄己集》，頁 3，「朱一貴供詞」。

西與朱一貴商議合作事宜，並互相豎旗拜把。23日，楊來、顏子京等先與清軍右營遊擊周應龍所率官兵交戰，但敗回下淡水。¹¹⁴4月26日，杜君英陣營復於赤山被右營遊擊周應龍之軍所敗。之後，官軍進駐赤山，杜君英乃糾眾二千仍往岡山與朱一貴等會合。

當時清軍方面，由於周應龍隨征熟番誤殺良民，使原走避入山的朱一貴陣營，乘機以「兵番殺掠」為由，鼓煽沿途村莊，於是「各鄉紛紛響應，豎賊旗幟」，¹¹⁵共有二萬餘人因此投順朱一貴。¹¹⁶此外，由於周應龍所領兵弁「多募市井亡賴；內地抽撥者，半係換名頂替；倉皇調集，股栗不前」。¹¹⁷面對朱一貴與杜君英兩大陣營之結合，及附近各庄民人的加入，民變陣營之聲勢自非庸官懦兵所能抵禦。4月27日，朱一貴與杜君英合攻周應龍所領官兵，「戰方合，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被擒、……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群賊大隊隨之」。¹¹⁸赤山之役告捷後，杜君英陣營在宛大江口地方與參將苗景龍兵接仗，將苗景龍殺死、守備馬定國亦自盡，乃攻陷南路營。¹¹⁹

官兵在赤山敗戰後，朱、杜紮營岡山，與出駐春牛埔的總兵歐陽凱兩相對峙。赤山之敗傳至府郡，文武官員譁然大震，「各遣家屬宵遁，先後駕舟並出鹿耳門，士民相率逃竄」。¹²⁰4月30日的春牛埔之役是在臺官兵與起事分子的第二次大戰，亦是清廷在臺勢力的最後反擊。當日，總兵歐陽凱、左營遊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臺協水師副將許雲率兵五百，出筭春牛埔，列營以待。先是「軍中夜驚，鎮兵四散。己未黎明，稍集，人無戰心」。¹²¹5月1日，朱一貴與杜君英合力，以數萬人將歐陽凱等官兵四下圍住，加

¹¹⁴ 《臺案彙錄己集》，頁3，「朱一貴供詞」。

¹¹⁵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¹¹⁶ 《臺案彙錄己集》，頁3，「朱一貴供詞」。

¹¹⁷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140種，1831年原刊），頁366。

¹¹⁸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¹¹⁹ 《臺案彙錄己集》，頁3，「朱一貴供詞」。

¹²⁰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¹²¹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上清軍把總楊泰竟為內應，總兵歐陽凱遇刺墜馬，致使清軍慘敗。¹²²

朱一貴與杜君英於春牛埔大勝清軍後，立即攻克臺灣府，之後杜君英入駐總兵官署，¹²³朱一貴繼入臺廈道署。5月11日，朱一貴自立為王，年號永和。至此，清廷於臺可視為一短期的改朝換代。朱一貴與杜君英等人入駐臺灣府城的當日，北路亦有賴池、張岳等豎旗聚眾。賴池等合攻諸羅縣，北路營參將等雖出力拒戰，然因兵單無援，亦告不守。¹²⁴

朱一貴之亂得以速滅，除因後來清廷以大軍強勢壓境，及以保境衛鄉為訴求的義民之起外，更因其本身的內訌分裂。朱一貴、杜君英二股異籍勢力在起事之初，蓋因有著共同的目標與立場。然在分享勝利果實時，卻也開始面臨因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衝突與分裂。起事陣營中，原屬於杜君英陣營的閩籍，後多向朱一貴靠攏，進而反攻杜君英。演至後期，起事陣營中閩粵二籍夥眾，交相拼殺，勢同水火。

朱、杜衝突的原因有二：一是領導權的爭奪，一是軍紀的問題。在領導權的爭奪方面，雙方在合力攻入府城之後，杜君英有意立其子杜會三為王，但因眾不服，乃議立朱一貴。¹²⁵最後，原與朱一貴勢力相埒的杜君英，只能封得國公之職，此種結果，自令杜君英心生不甘。此外，朱一貴與杜君英二人對所領民兵的管理態度更是南轅北轍。杜君英在起事之初，皆任所率夥黨恣意劫掠，毫無紀律。¹²⁶此種行事風格與朱一貴「行令頗嚴，掠民財物者，聞輒殺之，或民自撲殺，賊黨莫敢護」的堅持大相逕庭。¹²⁷在爭奪領導權失利後，杜君英行徑更變本加厲，任事驕蹇，放任所黨夥眾淫掠婦女，因此引發與朱一貴等人的進一步衝突。

¹²²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4。

¹²³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6。

¹²⁴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6。

¹²⁵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9。

¹²⁶ 如「四月二十八日，杜君英、戴穆到小的莊上放火燒房」、「杜君英賊眾到小的莊上殺人放火燒屋」、「五月十三日，杜君英賊夥到小的店裡勒索助餉，小的沒有給，他就吊打」，參見《臺案彙錄已集》，頁16，「朱一貴謀反殘件」。

¹²⁷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146種，1764年原刊），頁274，「災祥」。

起先，杜君英所領某一粵民「先年聘女年治，女嫌其貌寢，不許，及是，乃夜持刃挾淫之」。待該女母親往告朱一貴後，朱一貴乃派人往捕，將之殺於水仔尾。¹²⁸後來，杜君英又因淫掠吳外戚屬，而與吳外結怨，朱一貴得知此事後，遣楊來、林璉前往查問，反遭杜君英收縛。於是，朱一貴復遣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至此，已見反清陣營中分裂之勢。杜君英陣營因此認為「粵黨以入府無所獲，且亂自粵莊始，而一貴非粵產，因有異謀」。¹²⁹而原屬杜君英陣營之郭國正、江國論、鄭文遠、胡君用、林璉等閩人，後皆與粵籍的杜君英決裂而靠向閩籍的朱一貴陣營，甚至領命舉力圍剿杜君英（見表 2）。即如林師聖「閩粵分類」中所言：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亂，有偽封國公杜君英者，粵之潮州人也。其旗賊眾最雄，閩之賊俱忿恨之。於是，合眾攻君英。諺有云：十八國公滅杜是也。¹³⁰

因己方勢力分化，杜君英遂不敵閩籍勢力的結合聯攻，乃與林沙堂等人，率領粵人數萬敗走虎尾溪，一路剽掠閩人村社，戕殺閩人，¹³¹「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崁以北爾」。¹³²

¹²⁸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 274。

¹²⁹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 274。

¹³⁰ 林師聖：《臺灣采訪冊》，頁 34，「閩粵分類」。

¹³¹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 274。

¹³²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9-10。

表 2：杜君英陣營倒戈至朱一貴陣營之人物表

姓名	居處、生業	招者	豎旗地點	參與者	封職	備註
江國論	在南路淡水種蔗	劉國基	南淡水牛稠埔	戴 穆	國公	
林 曹	在南淡水耕田	□□□	新園	胡君用、□ □、林璉		
鄭文遠	在阿猴社推牛車趕食	江國論、 王滿	阿猴社		國公	後曾追剿杜君英
林 騫	在鐵線橋種蔗	江國論、 戴穆	新園	胡君用、林 璉、林曹	平北侯	往南淡水討帳時入 夥
林 璉	在笨港種蔗生理	戴穆	新園	胡君用、林 曹、林騫	平臺侯	往南路討帳時入 夥，後同江國論們 往北路追杜君英
胡君用	在南路下淡水嵌頂住	戴穆	新園	林曹、林 騫、林璉	靖海將軍 靖海侯	後帶人去征杜君英
陳 燦		陳福壽	檳榔林	陳福壽	平南侯	
黃 和			新園	林 曹	副將	
柯 朝		林曹	新園	林 曹	遊擊	
王 萬		鄭文遠				
王 壯		鄭文遠				
蔡 妙		鄭文遠				
鄭元長	在臺開糖鋪	江國論、 戴穆	新園		將軍	去追杜君英

資料來源：〈朱一貴謀反殘件〉，《臺案彙錄已集》，頁 4-15。

朱一貴與杜君英兩大陣營自 5 月中決裂後，閩粵二籍屢相併殺，閩籍對杜君英所率粵籍夥眾極力圍堵聯剿，「飛虎等大殺之（杜君英等）赤嵌樓下，血盈渠」，¹³³「殺人盈城，尸首填塞街路，福安街下流水盡赤」。¹³⁴如此慘烈的拼殺，自令下淡水地區的閩粵關係隨之緊張。於是，下淡水客民在設營後，「自五月中賊黨既分閩、粵、屢相併殺。……南路賴君奏等所糾大莊十三、小莊六十四，並稱客莊，肆毒閩人。而永定、武平、上杭各縣之人，復與粵合，諸泉、漳人多舉家被殺被辱者」。¹³⁵朱一貴陣營亦於 6 月 13 日，遣人糾漳、泉人數千，分渡下淡水溪，抵新園、小赤山、萬丹、濫濫等處，「圖併客莊」，¹³⁶此即為朱一貴事件導致閩粵二籍分類互鬥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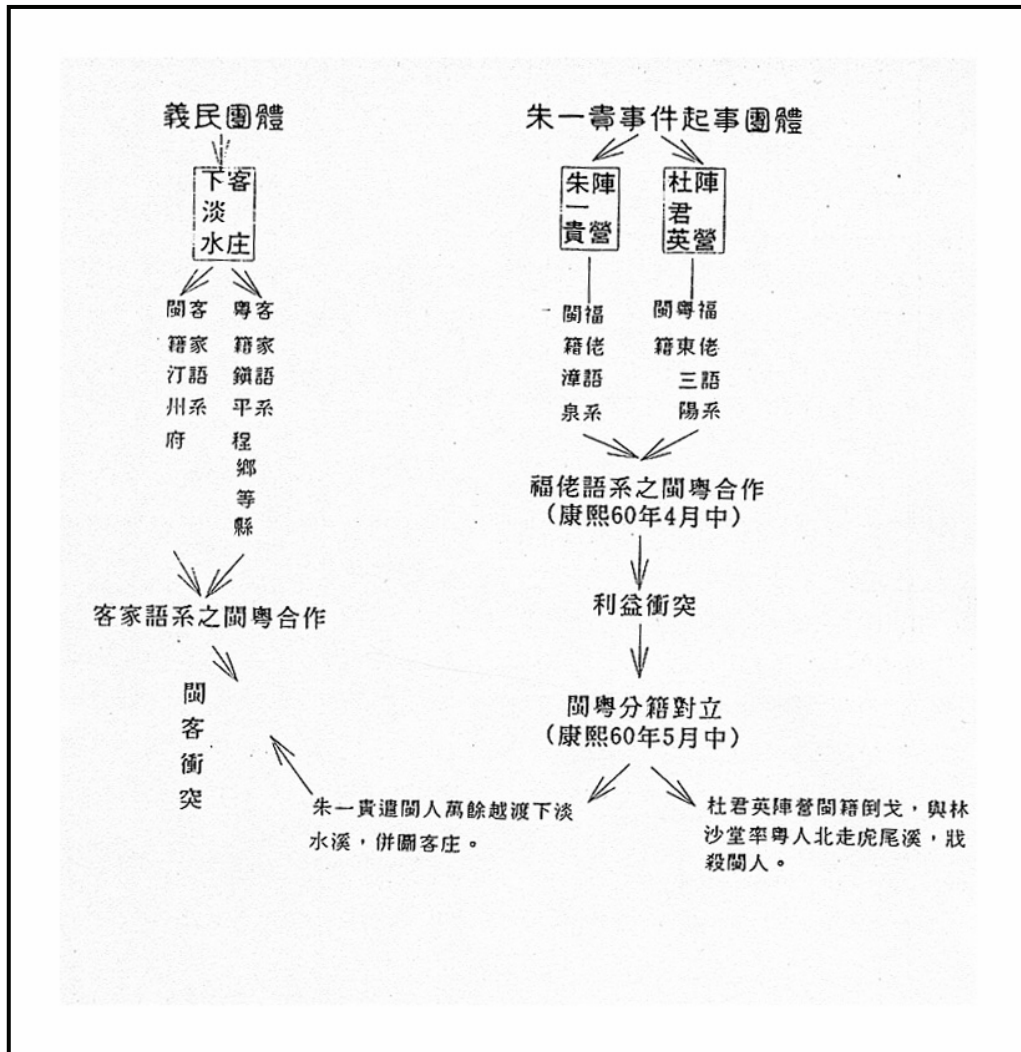
¹³³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369。

¹³⁴ 林師聖：《臺灣采訪冊》，頁 34，「閩粵分類」。

¹³⁵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13 種），第 15 卷，雜紀 祥異（附兵燹），頁 558。

¹³⁶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370。

圖 7：朱一貴事件中族群結合與分立過程圖



資料來源：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180。

綜上可知，若僅以省籍分類的觀點看朱一貴事件期間的閩粵關係，實難以呈現當時族群關係的真實面向，因為粵籍與閩籍移民之間均存在著客語與非客語群的歧異。釐清了杜君英陣營的粵籍福佬身分，即可瞭解朱一貴事件起事之初是同屬福佬語系的閩粵二籍合作之勢，當時屏東平原的客家人亦是呈現同屬客家語系的閩粵二籍合作之勢，即與漳、泉同屬閩籍的

汀州府民，由於語言文化的類同，亦多傾向與粵屬客家人合力抵禦外敵，充分反映縱向的語群界線。兩大陣營決裂後，福佬陣營中閩粵分裂，至此，與閩籍福佬的朱一貴陣營相對立的，除了原閩粵結合的客家語系陣營之外，再加上粵籍福佬語系的杜君英陣營。

釐清整個朱一貴事件當中人群分類的始末之後，更有助於瞭解所謂的「康熙辛丑，朱一貴為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率眾先迎，稱為義民。粵莊在臺，能為功首，亦為罪魁」¹³⁷當中，所指涉的為功首、為罪魁的二股粵籍人，其實有著不同語群的意涵。總之，清代屏東平原漢人間的族群關係，若僅以祖籍地的分類來觀察，難免失真，需加上語系的考量，方不致忽略可能的面向。

經過朱一貴事件，人群的分合幾經變化。粵省福佬先認同於方言群，之後又以省籍認同與閩省福佬分裂。或許有人會質疑，朱一貴事件之後，漢人族群關係的認同方向是否有所變化？其答案或許可自藍鼎元於朱一貴事件發生之後的〈諭閩粵民人〉中一窺大概：

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概勿論；以後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讐。漳、泉、海豐、三陽之人經過客莊，客民經過漳、泉村落，宜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¹³⁸

由上文可知，漳、泉、海豐、三陽與所謂的客莊或客民，在藍鼎元的認識中，是兩個對立的人群，其分別顯而易見地，仍是以方言群為界。此人群的分界不僅存在於朱一貴事件發生之前，即使歷經朱一貴事件中粵省福佬認同曾由方言群變成省籍（或許僅是福佬語系中的省籍），但當時的官員並不會因此認為粵省福佬會跨越方言群的界線，而與粵省客家融洽相處。

清代屏東平原的族群關係有其別於其他區域的特殊性。當地的客家人

¹³⁷ 《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頁 362，第 11 卷，武備（三）義民 附考。

¹³⁸ 《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頁 633，第 21 卷，藝文（二）文移 諭閩粵民人（代）。

約與福佬人同時進墾屏東平原，不僅數量龐大，且占墾所有沿山沖積扇端水泉最為豐沛的內陸平原。¹³⁹如鄭光策〈上福節相論臺事書〉中所言：

按全臺大勢，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以南
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二邑多閩邑。以內外論，
則近海屬漳泉土著，近山多廣東之客莊。廣民驕悍騰銳，器械精
良，閩民亦素畏之。¹⁴⁰

朱一貴事件之後，屏東平原的客家移民更進一步藉由鄉團組織，逐漸形成以客家語群為認同標準的自治組織，此使當地的客家聚落雖為福佬與平埔族群所包圍，仍顯得相對強勢。清代屏東平原客家聚落的堆制之設，主要是基於原鄉的生活經驗、當地不同族群的錯落、族群間勢力相當，及生存危機感而因應而生的自保自衛組織。客家族群的六堆組織在有事之時，為助官平亂的鄉團組織；平日無事時，各堆各庄亦皆有自治組織與防禦工事，且藉由土地關係及嘗會組織達成跨庄跨堆的聯繫與交流，增強六堆客庄的團結力，形成以六堆組織凝聚全體，以語群為界定範圍的自治組織。¹⁴¹客家族群在清代屏東平原的團結與相對強勢，使得當地的族群關係顯得相當不同，漳泉械鬥少見於當地，常是漳泉合而與粵鬥，如蔣師轍所言「漳泉合又與粵仇，勾眾忿鬪，鳳山最甚」。¹⁴²尤有進者，當地的平埔族亦多與福佬合作，傾向福佬化。¹⁴³

¹³⁹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頁 35。

¹⁴⁰ 鄭光策：〈上福節相論臺事書〉，《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第 229 種，1966 年），頁 17。

¹⁴¹ 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頁 130、204。

¹⁴² 蔣師轍：《臺游日記》（文叢第 6 種，1957 年），第 3 卷，頁 127。

¹⁴³ 根據戴炎輝的研究，住在赤山、萬金的平埔族直至日治前一直與粵籍處於敵對關係，且曾與佳佐聯合對付粵籍。平日，寧取路於福佬人聚落佳佐，而不通行向粵人聚落的五溝水、大林之路。其與住在萬巒庄的福建籍人不僅保持友善關係、互相貿易，且進一步吸收福建籍的語言、風俗，逐漸福佬化。參見戴炎輝：〈赤山地方的平埔族〉，《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1979 年），頁 741-742。

三、道光 26 年之福客械鬥

朱一貴事件之後，屏東平原漢人間的分類情形如何，由於留存的相關記載多以閩粵的省籍界限視之，因此難以藉之瞭解其中語群的分類作用。但在道光 26 年的軍機檔有一「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奏臺郡南路鳳山縣閩粵潮民人挾嫌互相焚搶殺人、督帶大兵彈壓止息，先後拏獲首要各犯嚴審律辦地方臻安靖摺」，記載了當時屏東平原上的一起械鬥事件，其中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訊息。當時的臺灣總兵武攀鳳及臺灣道熊一本在聯名具奏此事時，即先明言此次械鬥，並非單純的閩粵械鬥，因為當時與粵人鬥殺的，除了閩人之外，尚有素與閩人交好的粵屬潮州人。此次分類衝突，係起於荖籐林與萬蠻（萬蠻）庄的竊牛事件，客家移民與閩、潮移民的衝突自此向外擴散，造成鄰近閩、潮民人與客家人聚落間相互焚搶鬥殺，隨後在臺灣總兵武攀鳳的坐鎮下出兵平亂。以下以各庄的衝突分別說明。

（一）荖籐林與萬蠻庄

道光 26（1846）年 2 月間，萬蠻庄粵人林增四走失水牛一隻，懷疑為荖籐林庄人所偷牽。22 日，荖籐林庄閩、潮民人陳阿畝與陳阿察、陳江河等因迎神，途經萬蠻庄，林增四與林阿成等懷疑陳阿畝等人即為竊牛之賊，雙方發生衝突。林阿成、林增四與林烏番等人，將扛神轎之閩人龔阿貴、潘循等 6 人擄禁，陳阿畝及其他夥眾被迫丟棄神轎逃出萬蠻庄外。陳阿畝等敗逃途中，途遇返庄的採樵粵籍男婦利阿五、陳阿七等 17 人，乃將其擄去，意圖報復。林阿成聞訊，於 23 日糾邀陳細等數十人，往攻荖籐林庄，焚屋搶掠；陳阿畝亦糾陳阿就、陳乞食等十餘人出而迎鬥，閩粵二籍拼殺，互有死傷。¹⁴⁴

¹⁴⁴ 「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奏臺郡南路鳳山縣閩粵潮民人挾嫌互相焚搶殺人、督帶大兵彈壓止息，先後拏獲首要各犯嚴審律辦地方臻安靖摺」，《道光朝軍機檔》，79160。

(二)加走庄與四溝水庄

萬蠻等庄發生械鬥事件後，總兵武攀鳳親督兵勇往赴彈壓，且飭令把總鄭大口、效用陳口魁及屯弁劉安邦等，帶領屯丁兵勇，趕赴荖籐林，押放遭陳阿畝等人擄禁之粵籍男婦。在此之前，四溝水等庄粵人，聞知鄰近的加走庄閩、潮人幫同荖籐林庄，與萬蠻等庄客民互鬥，遂自行糾眾往攻洩忿。2月27日，效用陳口魁督帶屯番赴荖籐林庄押放遭擄粵籍男婦，途經加走庄時，該庄閩人口鉗，誤以為係粵人攻庄，乃在竹林內點放竹銃，誤將陳口魁擊斃。¹⁴⁵

(三)苦瓜寮、頭溝水、社寮、頓物潭、新街等庄

道光26（1846）年3月18日夜，傀儡山腳一帶閩潮民人許口等，於19、20等日糾邀葉忠等數十人攻搶頓物潭、新街等粵庄，放火燒燬房屋不計其數。粵人曾添來聞訊後，亦於3月24至27等日，糾邀徐細苟等數十人，往攻苦瓜寮、頭溝水、社寮等閩庄，亦焚毀房屋，傷斃人命，且將帶兵彈壓之隊目邱仕禮銃傷。¹⁴⁶

綜上可知，起因於竊牛細故所引發的閩粵械鬥，如野火燎原般自萬蠻、荖籐林庄擴散至鄰近各閩粵村落。清廷恐其關係更加緊張，乃由總兵武攀鳳負責查辦其事。武攀鳳於3月27日自郡府起程，於翌日抵鳳山縣城。當時下淡水各閩粵庄眾，在得知官府將派大兵臨境後，紛紛止息逃竄。武攀鳳見此，乃決定先將大兵駐紮縣城，遣代理鳳山縣知縣同知玉庚、南路營參將都司蔡凌標等，至下淡水地區傳集曉諭，並委派部分兵弁往拏彈壓，以防逆匪乘隙搶割早稻。在官兵的搜拏下，陸續將陳阿畝、陳戇狗、張令、江查某、蕭泰、王獅等拏獲。武攀鳳於4月22日撤隊回郡，酌留三百名兵於下淡水，幫同鳳山營縣查拏逸犯。¹⁴⁷

¹⁴⁵ 《道光朝軍機檔》，79160。

¹⁴⁶ 《道光朝軍機檔》，79160。

¹⁴⁷ 《道光朝軍機檔》，79160。

即如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在奏摺中所言，當時屏東平原的粵屬潮州、嘉應州民人，因語言、習性有所差異，故彼此成仇，素分氣類。潮州人轉與閩籍漳、泉交好，造成嘉應州客民稱潮州庄民為「潮人」、潮州人稱嘉應州庄民為「粵人」的情形，遇有細故爭糾時，潮人依附漳、泉籍民，與粵人鬥殺。¹⁴⁸其實，道光 7（1827）年閩浙總督孫爾準即奏言：

臺灣無土莊之民，皆閩粵兩籍寓居，粵則惠、潮二府、嘉應一州；閩則漳、泉、汀三府，汀人附粵而不附閩，粵人性狡而知畏法，為盜者頗少。惠、潮兩處之人，聯為一氣，嘉應則好訟多事，與惠、潮時合時分……臺灣縣……民氣最馴，鳳山縣土沃民稠，較臺灣縣為難治。¹⁴⁹

自上可知，至道光初年，閩屬之汀州移民仍是傾向「附粵而不附閩」，而粵之惠、潮移民則與嘉應州民處於時合時分的狀態。此尚是臺灣一般的狀況，若以武攀鳳等人所言，似乎可更明確的瞭解當時屏東平原的族群關係。這種「潮與粵分、汀與粵合」的情形或不必然能向前推論，但自朱一貴事件期間覺羅滿保的觀察來看，此種情形應是自康熙年間即一直持續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粵」省，其人群實應包含福佬與客家兩大方言群在內。但由當時潮州府人稱嘉應州移民為「粵人」的情形看來，其已自別於「粵籍」之外。若再從姚瑩〈答孝信齋論臺灣治事書〉中所言觀察：

然而臺地，……有泉人焉，有漳人焉，有粵人焉，有潮人焉，有番眾焉。合漳、泉、潮、粵、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為民。¹⁵⁰

文中，姚瑩將「粵」、「潮」分而論之，似乎亦可看出所謂的「粵」在部分清人的認識上，較傾向於解釋客家方言群。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無論是當地客家族群或官員，均知清代下淡水地區的客家聚落，不僅有粵屬客

¹⁴⁸ 《道光朝軍機檔》，79160。

¹⁴⁹ 「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為查辦械鬥完竣籌議善後事宜摺」，《道光朝軍機檔》，058972。

¹⁵⁰ 姚瑩：〈答孝信齋論臺灣治事書〉，《東槎紀略》（文叢第 7 種），頁 110。

家人，亦有閩屬汀州移民。但對於當地來自閩粵二省的客家族群，官府卻皆以「粵民」視之，當地客家族群亦以「粵民」自稱。¹⁵¹即當時的認知，下淡水的閩屬汀州客家，似乎已被化約至「粵」的意涵中。如此看來，清代屏東平原的閩粵關係中的「粵」籍的定義，似乎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粵」涵意的不確定性，造成史料解釋的困難。此一部分，尚需更多資料做進一步的釐清與瞭解。

總之，清代屏東平原的分類衝突，省籍並不是人群分類的界定標準，也就是說，當時屏東平原漢人的族群關係，與其說是依分籍對立，毋寧說是依語言分類，因為只有從這個觀點切入，方能瞭解為何當時閩屬汀州移民「附粵不附閩」，以及粵屬潮、惠二府移民多與漳泉交好的現象。

肆、結論

對於清代臺灣漢人的族群關係，以往多以省籍的概念解釋。本文從清代屏東平原的例子，說明方言群在當時可能的作用。鄉黨或祖籍，其範圍可大至一省一州，亦可小至一縣一鄉，甚或一村。而方言的界線，可能與行政區域疊合，亦可能跨越鄉黨或祖籍的範圍，因此若仍僅以祖籍或鄉黨觀念分析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可能會因此忽略在方言界線與政區界線交錯下，人群因應現實環境所可能選擇的族群認同。

提出方言群的思考方向，並非表示清代臺灣的族群關係必然以方言群分界，只是希望在以往祖籍的單線分類之外，提供另一個可供參考的面向。

¹⁵¹ 如林爽文事件發生期間，乾隆 52（1787）年，當時留營隨征的六堆鄉勇，曾以副總理劉繩祖、周敦紀、曾秀為首，曾上予將軍常青一呈文，言「粵民等祖父，自康熙六十年、雍正十年，逆匪朱一貴、吳福生等先後倡亂，屢從征剿，皆邀議敘職銜……。今賊首林爽文、莊大田等南北肆擾……粵民等因遵康熙、雍正年間各義民祖父設堆堵禦之例，推舉人曾中立為總理，分設六堆，統計義民八千餘人，屢經打仗殺賊……」。由此可知，雖然當地的客家族群來自閩粵二省，但對外卻仍以「粵民」自稱。《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 年），頁 572。

方言群與省籍其實是縱橫兩條界線，可以分隔出四個不同組合的省籍與方言群的族群屬性。四個區塊中，清代來臺移民中，粵省以客家人占多數，閩省以福佬人占多數。閩屬汀漳客、粵屬潮州福佬常被淡化忽略，而這也是如今大部分人對清代漢人會產生「粵＝客、閩＝福佬」印象的原因之一。閩屬客家、粵屬潮州福佬，或許由於來臺人數不多，很難形成一股主位勢力，只能採取依附的角色，也正由於其族群屬性不被重視，造成他們在臺灣歷史上常被有意忽略或被誤解，尤其是粵省福佬方言群，在清代臺灣，像是一個隱形的族群，或者說，是被隱形於粵省的面具下，被當成客家處理，也因此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中留下一片隱晦不明的灰色地帶。關於此兩類人群的族群屬性如何，需要更多資料做更細緻的研究。

以往對閩籍多能察知其內部的分歧，如漳、泉械鬥、頂下交拼等情形，相對來看，學者似乎將渡臺之粵人視為同質性高的族群，對其彼此間的可能對立與衝突少有瞭解與描述。對於祖籍或鄉黨概念的強調，及對語群的忽略，其實是臺灣史研究中長期以來的現象。造成這種情形其實有其不可避免的客觀因素，即由於同屬福佬的漳泉在臺灣漢人族群中占極大多數，因此，表現出不同於其他東南亞華人社區閩南多自成一幫的情形，清代臺灣漳泉的差異被放大，人群間的衝突頻繁。在這清代臺灣常見的族群現象中，清代屏東平原的情形卻顯見其特殊性。清代屏東平原漢人族群關係的表現，在客家方言群方面，一如其他東南亞華人社區，多採呈跨省的方言群認同態勢。當地的客家族群結合閩粵二籍，自朱一貴事件之後，形成一個以方言群為認同範圍的鄉團組織，且藉由嘗會或土地關係緊密結合，使其在屏東平原中，成為一個相對強勢的族群。相應於此，清代屏東平原中，除了排灣族外，皆採取與六堆客家族群對立的統一戰線。不僅閩籍漳泉的福佬相對合作，粵籍潮州福佬亦傾向與漳泉形成跨省的福佬方言群結合，乃至當地的平埔族群亦採取與福佬合作的態勢。

本文雖強調方言群認同在清代屏東平原漢人族群關係的作用，卻並非認為方言群的認同作用必然大於祖籍或鄉黨意識。在不同區域內，移民人

數與其文化經濟力量的強弱會牽引出不同的族群關係。如另有研究表示，清代臺北地區的汀州永定客家人傾向福佬化。¹⁵²或依嘉義地區的閩粵械鬥指出，臺灣的分類意識，似乎特重閩粵省籍之別，未必是方言群的分別。¹⁵³如果族群的疆界是可能因應客觀環境而調整變動的，¹⁵⁴那麼清代來臺的漢人在離鄉背景的異地，處於不同地域且面對不同人群關係，在競爭與衝突的過程中，其結合的選擇必然會衡量彼此實力而有所調整。因此，省籍與方言群的認同作用，孰強孰弱絕非放諸四海皆準，而是依時依地更依族群勢力而有所不同。

¹⁵² 戴寶村：〈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史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1期（1998年10月），頁38。

¹⁵³ 如林爽文事件，南投中寮的詔安客提供同為漳州移民的林爽文（平和縣阪仔人）逃亡生路，因此留下「爽文路」地名。林爽文最大的敵人，為新竹一帶廣東饒平、陸豐客屬聯軍。張丙事件中，起事者張丙為白河「客庄內」的南靖客，響應者為嘉義新港的漳州龍溪福佬人陳辦。二者喊出「誓滅粵賊」口號，夾攻嘉義溪口的饒平客屬張阿凜。後波及高雄內門南靖許姓也起而攻擊該地的饒平劉姓。嘉義大林西半部的廣東饒平劉、陸豐張姓客屬，和東半部的福建永定江姓、南靖簡姓客屬，數百年來為水火不容的二個集團，清代爭水械鬥，今日仍為二大壁壘分明的派系。吳中杰：〈臺灣漳州客家分布與文化特色〉，《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6月），頁74。

¹⁵⁴ 「疆界」或「邊界」（boundary）是人類學家 Fredrik Barth 在研究族群關係時所提出的概念，也是日後被廣泛使用的分析概念。自 Fredrik Barth 以來，許多學者都同意，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a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根本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即族群的界線並非僵固不變，會隨著族群認同的變遷而被塑出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族群意識是人們因應不同環境的需求，所操控的一種策略性變數，族群意識應被視為社會變動的表現。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群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及調整。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年），頁130；鍾幼蘭：〈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社村為例〉，《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136；高怡萍：〈客家族群意識與歷史的文化建構－客家社區在原鄉與移民地之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3期（2000年7月），頁54。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道光朝軍機檔》

79160，「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奏臺郡南路鳳山縣閩粵潮民人挾嫌互相焚搶殺人、督帶大兵彈壓止息，先後拏獲首要各犯嚴審律辦地方臻安靖摺」。

058972，「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為查辦械鬥完竣籌議善後事宜摺」。

(二) 專書

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不著撰人，《清聖祖實錄選輯》，文叢第 1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不著撰人，《臺案彙錄已集》，文叢第 19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不著撰人，《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第 2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1987 年。

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王世懋，《閩部疏》。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52 年原刊）。

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年。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1764 年原刊）。
-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文叢第 7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937 年原刊）。
-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之部》。東京：富山房出版社，1909 年。
- 何翠萍、蔣斌，《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
-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宋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 李亦園，《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 年。
- 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汪毅夫，《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
- 周丹尼著，黃順柳譯，《砂勞越鄉鎮華人先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1990.
- 周昭京，《潮州會館史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周碩勳重修，《潮州府志》。高雄：高雄市潮汕同鄉會，1968 年（1760 年原刊）。
- 邵敬敏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年 1 月。

姚瑩，《東槎紀略》，文叢第 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829 年原刊）。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 年。

胡寅，《斐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方言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祝穆，《方輿勝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

陳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91 年。

陳國瑛等，《臺灣採訪冊》，文叢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陳藻，《樂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陳鐸等修，鄧廷祚等纂，《澄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年。

黃叔璥，《臺灣使槎錄》，文叢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722 年原刊）。

黃金文，《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 年。

黃家敦等編，《漢語方言論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 年。

黃挺，《潮汕文化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黃桂，《潮州的社會傳統與經濟發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箋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溫仲和，《嘉應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1898年原刊）。
- 詹伯慧主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劉業勳修，凌魚纂，《揚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劉廣聰纂，《〔康熙〕程鄉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 蔣師轍，《臺游日記》，文叢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鄭昌時，《韓江聞見錄》。香港：香港潮州會館，1979年。
-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1979年。
- 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
-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1831年原刊）。
- 謝重光，《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謝劍，《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
- 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1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
- 羅翹雲，《客方言》。臺北：古亭書屋，1972年（1922年原刊）。
- J. J. M. De Groot（高延）著，袁冰凌譯，《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三）論文

- 尹章義，〈臺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比較研究法－以臺北及高屏地區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6月。

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年。

安煥然，〈論潮人在馬來西亞柔佛麻坡的開拓〉，《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8卷2期，2002年。

吳中杰，〈臺灣漳州客家分布與文化特色〉，《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6月。

李新魁，〈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9卷1期，1993年。

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林汀水，〈略論福建聚落分布的發展變化〉，《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林立芳、莊初升，〈粵北地區漢語方言概況〉，《方言》，2000(2)，2000年5月。

林倫倫，〈廣東閩方言的分布及語音特徵〉，《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8卷2期，1992年。

林倫倫，〈廣東閩方言語法特點的比較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9卷2期，1993年。

林倫倫，〈廣東揭西縣方音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0卷3期，1994年。

林浩，〈客家文化新論〉，《客家研究輯刊》，1997(1)，1997年3月。

林嘉書，〈從文化角度談談客家方言研究〉，見氏著，《土樓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邱彥貴，〈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東方宗教研究》，第3期，1993年10月。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

- 高怡萍，〈客家族群意識與歷史的文化建構－客家社區在原鄉與移民地之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3期，2000年7月。
- 許文雄，〈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福佬客家械鬥〉，收於《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
- 郭志超，〈閩客民俗宗教的比較研究〉，《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 曾少聰，〈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比較研究－以長汀客話和九峰客話為例〉，《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 詹伯慧，〈廣東省饒平方言記音〉，《方言》，1993(2)，1993年5月。
- 賈鶴，〈略述客地明代社會概況與客人外遷〉，《客家研究輯刊》，1994(1)，1994年3月。
- 劉佐泉，〈客家史料擷英〉，《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4期，2001年12月。
-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 戴寶村，〈大臺北地區客家族群史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1期，1998年。
- 鍾幼蘭，〈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社村為例〉，《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 簡炯仁，〈高屏地區土地開發與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
- 蘇慶華，〈北馬潮人早期之經濟活動初探〉，《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8卷2期，2002年。
- Myron L. Cohen,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al-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Rethnohistory* 15(3), 1968.